



工 作 简 报

Work Briefing XIII

第十三期

2017 年月 1 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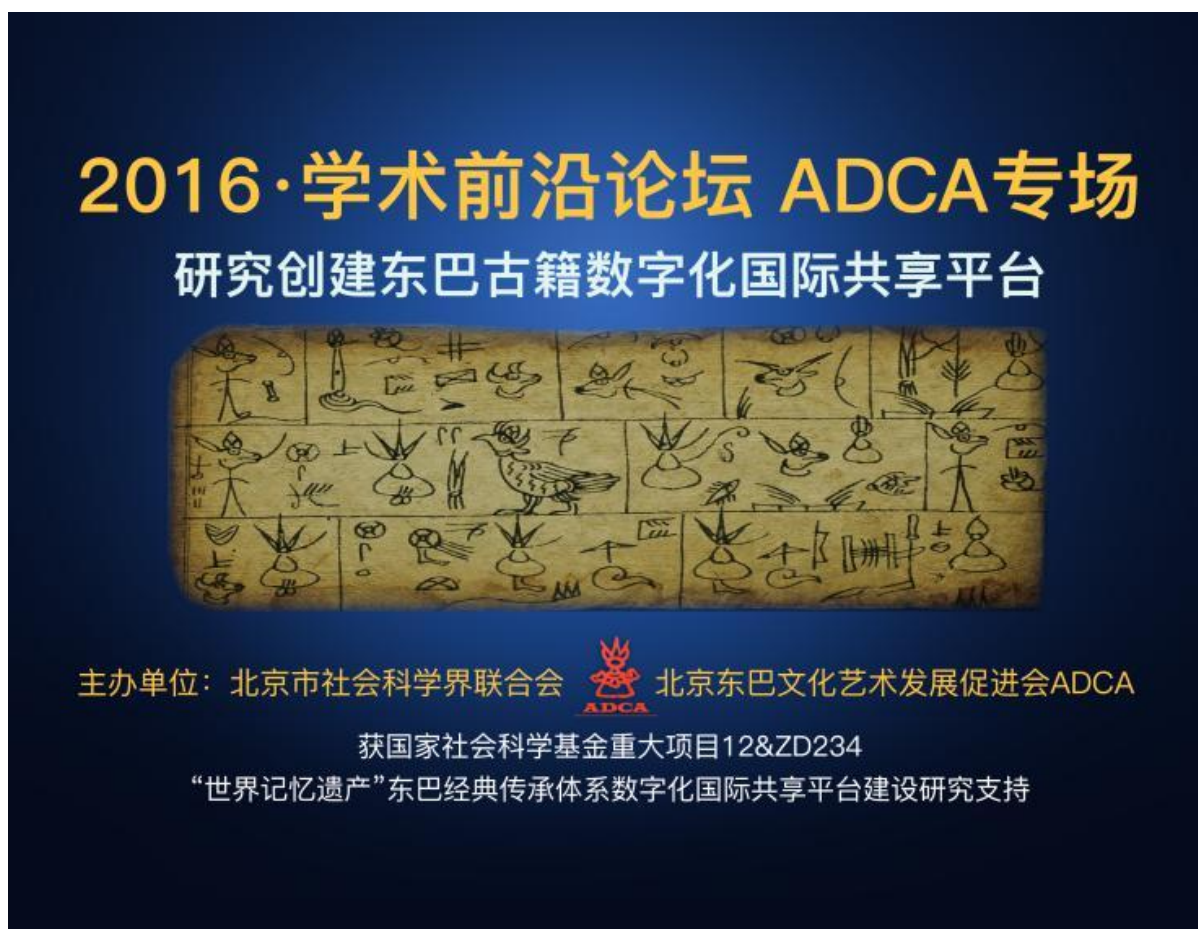
【国家课题动态】National Key Project News.....	2
2016•学术前沿论坛-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 丁春艳.....	2
【公益救助】Public Welfare Rescue Works.....	10
倾心救助东巴祭司 医德高尚无私奉献.....	10
传递来自北京的关爱.....	11
【社科活动】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13
“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抢救研究成果展示研讨会.....	13
“中国梦:协调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 学术前沿论坛会议纪要 赵玉超.....	14
【学界文摘】Academic Article Abstracts.....	16
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冯骥才.....	16
玉龙情殇:殉情——纳西人婚恋的另一面..杨福泉.....	17
纳西族口头传统特征刍论 杨杰宏.....	29
纳西原乡俄亚大村 和继全.....	35
【海外文坛】Overseas Literary Circles.....	33
《约瑟夫·洛克在中国》Our Man in Cnina - Joseph Rock By Mike Edwards 迈克·爱德华兹 撰文 / 白 枫 译文.....	37
《雅克 巴库,从西藏的寺庙到索邦大学的课堂》Jacques Bacot, des monastères du Tibet aux salles de la Sorbonne By Nathalie Bazin 娜塔莉·巴赞 撰文 / 范豪毅 译文.....	50
【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	62
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成立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发布.....	62
【纳西赤子 东巴行者】—追思挚友解毅先生 张旭 塔尤拉姆.....	65
【新书讯息】New Book Message.....	66
《探寻纳人古迁徙路》评介 姚进.....	66
【国际交流】International Exchange.....	67
法国卢瓦河畔东巴文化传播之策划 张立.....	67
【回音壁】The Echo Wall.....	68
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促进会的评价摘选.....	68
【简讯】Newsletter.....	70
郑晓龙先生获“最佳导演奖”.....	70
白庚胜博士再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	70
纳西族“殉情”演出专场亮相 2016 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	70
杨福泉博士撰写系列篇《纳人祖先文化寻踪散记》.....	70
【会员风采】Members Update.....	70
天雨流芳-台湾艺术家于涌、蔡振源昆明办展.....	71



【国家课题动态】 National Key Project News

2016·学术前沿论坛-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研究



2016·学术前沿论坛 ADCA 专场

2016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了2016·学术前沿论坛-ADCA专场“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支持。论坛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子课题2组负责人、纳西族学者白庚胜博士主持。

来自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北京晚报和在京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在校研究生参加了此论坛。



纳西族著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博士主持学术前沿论坛

东巴古籍文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记忆遗产”，是当今世界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书写的书籍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序传承和多民族包容和谐的实证，是人类形成文字初期时思想文化的实例。在人类学、文字学、生态学、哲学、史学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的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引导下，为了传承这一人类独有的古文字研究，我们将加速抢救性数字采集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收藏在国外和潜藏于民间的东巴古籍藏本，把海外回归祖国的数字化古籍带给老东巴火速进行释读、翻译和编目，并对已经释读和翻译的东巴古籍进行较系统的分类、保存与研究，采用现代信息化创新手段构建面向由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从速抢救保存这一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绝学地位的“世界记忆遗产”，实现东巴文化的传承。



2016·学术前沿论坛 ADCA 专场于2016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社科联举行



本次论坛主题是“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传承与跨学科数字化创新。主旨是面对流失海外的东巴古籍藏品的现状，面向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活着的象形文字”，研究如何采用数字网络化技术进行东巴经典文化遗产抢救与传承相的新模式。面向在世界文化史上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化，探讨采用文理工学科交叉及国际合作的途径，抢救性采集分散在海内外的东巴经典古籍藏本的数据。研究采用现代信息化创新手段构建面向东巴象形文字的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实现濒危状况下的东巴古籍及东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首席专家徐小力教授在学术前沿论坛发言

首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234 首席专家、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技术顾问徐小力教授做了题为“用‘活着的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古籍的探寻、研究与共享”的报告。徐教授介绍说：中国纳西族创造的东巴文是当今公认的世界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被称为“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经典古籍是由具有独特图形及发音的东巴文写成，是研究是世界上相关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学者（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挪威、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瑞士、荷兰、波兰以及中国等）收集、探寻及研究纳西族东巴经典古籍。东巴经典古籍具有在世界上广泛分布的特点，收藏于十多个国家：如中国（丽江、昆明、北京、南京、台湾）、英国（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法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法国远东学院等）、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等）、德国（德国国家图书馆等）以及西班牙、瑞典、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由于大部分东巴古籍广布世界各地，国内外东巴经典学术研究处于分散的状态且彼此沟通不便；目前能释读东巴经典的川、滇、藏区的几位老东巴祭司已年逾古稀，经典传承面临濒危现状。

徐小力教授对东巴祭司在历史上的地域分布与其传承的现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同时介绍了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1. 探寻散落的东巴古籍以及抢救性释读回归的东巴卷；2. 代表性东巴经典古籍《创世纪》的探寻与研究；3. 东巴经典古籍《创世纪》的学术价值；4. 发布若干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长、东巴文化研究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234 子课题 1 组负责人张旭女士做了题为“东巴古籍数字采集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报告。张旭女士主要介绍了 2016 年在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和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机构的采集和调研以及世界范围的东巴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包括古籍的采集方法、途径与实施，同时阐述了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国家博物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国语言文化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等机构的古籍藏本进行的历史来源与



现状的调研，阐述了正在展开的国际学术研究。另外，还对东巴祭司释读数字化的东巴古籍的问题，和在田野调研时进行音视频记录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表述。



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子课题-1 组负责人张旭在论坛发言

在抢救性释读古籍的工作中，让张旭和研究成员们最振奋的事情是，在香格里拉的老东巴祭司习尚洪在释读不同收藏机构的东巴古籍藏本时，陆续发现了已经在云南三坝地区绝迹的一套极其珍贵的《求寿经》，这个向天神祈求生育和长寿的《求寿经》的完整仪式也因为没有书籍而早已失传了。在2013年项目组从英国国家图书馆采集的藏本中，习东巴就发现了两本《求寿经》，他当时就异常感动。之后他凭记忆师傅的口传诵经，默写下了两本，这次能在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又发现了这一本，他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整套的《求寿经》就还缺一本了。他希望尽快找全这套古籍，在他有生之年恢复和传承这个求寿仪式。

张旭女士对东巴古籍的国际学术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翻译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早期研究者的东巴古籍学术研究资料，证明了纳西国际学术研究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西方世界的不同领域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探索渠道。从事研究的先期学者们多为探险家、植物学家、作家以及西方在各国的传教士们，而且他们除了不约而同地被这个象形文化的魅力吸引的共性之外，有些人如巴库和洛克等人还完成了从自身职业向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等过渡的角色。

可见这些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历史性地阐释了东巴古籍在国际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可惜的是这些学者们的研究多后继无人，国际东巴古籍的研究在历史与当代之间，就如东巴文化的传承本身一样，形成了令人遗憾的断层。

这些国外先驱学者们当年在纳西地域收藏并翻译的古籍版本的东巴古籍，已是存世的珍贵的孤本并具有特殊学术价值。因为这是来自早期的东巴大师们的释读，反映了东巴前辈们精良的文化传统和广博的知识，所以这些古籍翻译版本无疑会成为古代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珍贵历史遗存。

但是前人的翻译数量毕竟十分有限，所幸目前尚有少数相对全技能的老东巴祭司存世，还能释读采集于海外的古籍，这对于印证和比较那些西方学者的学术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对于抢救性释读更多的收藏在世界各国的东巴古籍就更为重要，这也证实了中国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东巴古籍的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旭认为：研究创建的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将使世界文化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东巴文化文明以高科技手段传承下去，造福现世的东巴祭司们和全球的研究者们。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234 综合组兼子课题 4 组负责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理事吴国新老师围绕“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途径与方式”向大家做了介绍。吴老师认为：信息化研究主要针对东巴象形文字的图形识别、语音辨识、内容释读等对东巴象形文字的形、音、义等进行共轨研究；针对用东巴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典古籍保护与传承进行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研究，上面这两大部分就是国际化东巴经典传承体系的共享平台具体实现手段。共享平台的建设途径主要涉及到：多学科交叉、国际合作、深入田野调查与采集、古籍数字化处理与存储、互联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古籍信息查询检索、国际共享与传播以及展示（交互、AR/VR 等）等方面。吴老师对平台的研究内容与方式做了详细介绍，主要内容包括：（1）东巴经典的数字化加工信息处理技术，（2）东巴经典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3）数据库与知识库的建库与管理方式，（4）数字资源的检索与网络传播方式。吴老师就上面多种方法深入浅出地向大家做了展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综合组兼子课题 4 组负责人吴国新副研究员在论坛发言

最后，吴老师结合以上研究内容与方式方法，通过多类型信息展示方法介绍了共享平台的传播方法，主要包括电子书记录方式、视频记录方式、文字与图像动态的动态交互方式、动漫卡通展示方式等。国际共享网络平台的终端实现途径主要包括共享信息平台网站、手机移动端、英文国际平台等三种方式，也在报告中向与会专家学者作了简要介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课题组成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姜可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英文平台的构建方法及过程。首先讲述了平台信息架构原则：信息架构的核心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信息构建是信息用户、信息内容与信息组织三者的交集，信息生态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用户、内容和组织构成了信息构建的三个生态环。有4个目标：（1）提供易于查找、易于获得的信息，（2）优化信息结构，（3）面向用户传达信息内容，（4）提供一个清晰的易于信息获得的界面。其次从信息到网站的建立过程做的介绍。包括建立导航、原型设计、研发沟通等信息，让大家充分了解了平台网站的构建过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课题组成员姜可教授在论坛发言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课题组成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陈若愚博士围绕“东巴古籍及相关文献的检索技术研究”做了报告。陈博士介绍了开展东巴古籍及相关文献检索技术研究的意义以及如何构建东巴古籍及相关文献的检索系统，其中重点介绍了东巴古籍元数据的规范建设。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课题组设计编写的东巴经典古籍藏品编目表格及课题组所采集的数据为基础，制定《东巴经典元数据规范》初稿。阶段二，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基础上，进行了元数据规范的补充与完善。阶段三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主要是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一百卷）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元数据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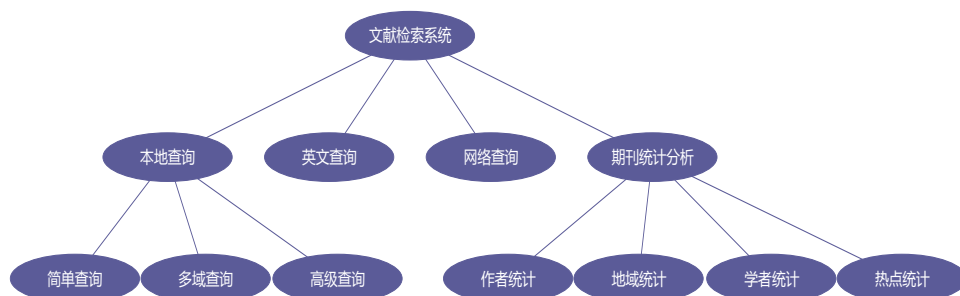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课题组成员陈若愚博士在论坛发言

陈博士还详细介绍了东巴古籍检索技术研究进展以及东巴相关文献检索技术研究进展。《东巴经典元数据规范》第二稿制定完成后，课题组开始了东巴古籍检索系统的研



究工作，包括：古籍编目数据抽取、古籍检索系统数据库设计、古籍检索系统界面设计。古籍编目数据抽取主要是基于元数据的抽取，首先对东巴古籍进行扫描，然后进行 OCR 识别，最后进行信息抽取得到 XML 文件。东巴古籍编目数据格式相对复杂，保存在传统关系型数据库中存在诸多困难。为此，课题组选择了名为 eXist 的 XML 数据库保存古籍编目数据，并使用 XQuery 语言进行查询。古籍检索系统分为：本地查询，英文查询，网络查询及期刊统计分析四个部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查找。



文献检索拓扑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子课题 3 组负责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李宁教授的研究生王玉娇为大家演示了东巴古籍信息检索系统，她向大家展示系统未登录时的界面，系统开始只有一些简单的检索功能，用户不能对系统库里的数据进行管理和操作，这样对系统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后她向大家展示了系统登陆之后的界面，这相比之前未登陆界面会出现一些管理员的相关权限，例如用户可以对数据进行修改等。王玉娇还使用简单检索功能，以纳西族著名的东巴仪式“祭天”和“人类迁徙记”为例，向大家进行了检索演示，检索的结果包含古籍详细信息如仪式名称、书写地区、东巴进行释读的音视频以及相对应的数字电子书等。然后，使用高级检索功能，以法国国家图书馆为例进行了检索，可以从平台数据库里面查看这个机构里有多少古籍收录在国际国际共享平台系统以及数字化采集了哪些东巴古籍。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玉娇演示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研究的检索

白庚胜博士做了论坛的总结发言，指出这次研讨会十分成功，也十分高端，很创新也很务实，从内容到形式给人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将东巴文化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东巴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感谢徐小力教授带领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组，全方面地向大家介绍了这项课题的进展情况、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



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为本次论坛奠定了很高的基调。张旭女士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包容的国际情怀、人文关怀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吴国新副研究员和陈若愚博士对于课题中涉及的技术问题，为大家做了精彩的介绍，推动了课题的顺利进行。姜可教授和王玉娇同学重要的补充和演示，使我们更加全方面更加立体地了解了这个课题的进展情况及这个课题更深一步的意义。

本次学术前沿论坛“研究创建东巴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也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研究成果的发布会和学术交流研讨会，研究方向与内容具有重要性、紧迫性与创新性，是东巴古籍的学术研究步入国际学术前沿高端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界正以跨学科研究的形式，为世界探索一个新的文理交叉的社科学术理论与实践，论坛的宗旨是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各界人士能更深层次地了解这门东巴文化绝学的价值，使这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古老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以数字化的科技创新形式得以传承与发展。



2016·学术前沿论坛-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参会人员

2016 学术前沿论坛主要新闻报道：

- 1 中国日报网【Symposium on digitizing Dongba pictographs held in Beijing】-王怡然
http://www.chinadaily.com.cn/culture/2016-12/27/content_27790940.htm 2016/12/27
- 2 北京晚报网站【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阎彤
<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1020543.html?winzoom=1> 2016/12/28 北晚新视觉
- 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取得新进展】-项江涛
http://www.cssn.cn/wh/wh_whrd/201612/t20161228_3362266.shtml 2016/12/28
- 4 中国社科报【建设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项江涛 2016/12/30
- 5 中国网-英文【Lost ritual scripts of Dongba Culture retrieved】-吴瑾
http://www.china.org.cn/arts/2017-01/01/content_40013357.htm 2017/1/1
- 6 中国青年新闻网 阎彤 <http://www.6czp.com/minsheng/285279.html> 2016/12/28
- 7 凤凰资讯 阎彤 <http://newsfenghuang.com/ztqw/dbwj/20161228/36562.html> 2016/12/28
- 8 阜新新闻网 阎彤 <http://lt-cut.com/otyty/xfgo/2016/1228/45458.html> 2016/12/28
- 9 云南新媒网 阎彤 <http://shangjiang888.com/nzc2i/vygl/20161228/30961.html> 2016/12/28
- 10 光明网 金振荣 http://culture.gmw.cn/2017-01/04/content_23406081.htm 2017/1/4
- 11 搜狐网 金振荣 <http://mt.sohu.com/20170104/n477796089.shtml> 2017/1/4
- 12 新民网 金振荣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7/01/04/30735959.html> 2017/1/4
- 13 博弈在线 金振荣 <http://www.000219.com/show-203-531523-0.html> 2017/1/4
- 14 中国与非洲【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王秉仪
http://www.chinafrica.cn/chinese/mrxw/201612/t20161228_800084284.html

丁春艳 供稿



【公益救助】Public Welfare Rescue Assistance

倾心救助东巴祭司 医德高尚无私奉献

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举办的 2016·学术前沿论坛-ADCA 专场“研究创建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暨北京市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员大会上，张旭会长特别感谢了“厚善堂”的创办人赵雪杉医生及“厚善堂”的医生们对东巴文化抢救与传承工作做出的贡献，并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纳西族著名学者白庚胜博士代表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组向赵雪杉医生赠送了锦旗，表彰和感谢“厚善堂”医生们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使年迈体弱的老东巴祭司们能够有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抢救释读东巴古籍。



中国作协副主席、纳西族学者白庚胜博士代表促进会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组向“厚善堂”赵雪杉医生赠送锦旗



右起：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赵雪杉医生、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会长张旭、秘书长姚进在两会现场



传递来自北京的关爱

促进会每年对老东巴祭司进行持续的医疗救助，此外，会员们心中一直挂念着老东巴祭司们的身体和生活，除了定期去看望老东巴祭司和寄去他们所需的药品外，每季度都会为老东巴捐献生活物品。



2016 年底，白枫副秘书长代表全体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成员给居住在云南藏区香格里拉白地的和志本老东巴祭司寄去了降血压的西药和能明目的中药；给生活在边远深山的习尚洪老东巴祭司寄去了两床厚棉被，希望老东巴们在春节前能够收到并感受到大家的关怀。



在 2016 年释读东巴古籍的工作期间，习尚洪东巴祭司把他绘制的东巴画赠送给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
东巴象形文：“白水台自然神保佑大家长寿富足”，签名：习尚洪东巴在东坝日树湾村于火猴年 73 岁时画



【社科活动】 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世界记忆遗产” 东巴古籍抢救研究成果展示研讨会

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和北京市社科联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在社科联 304 会议室召开了“东巴文化展览研讨会”，该展览将由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在 2017 年联合主办。研讨会对如何更好地体现习近平主席于 2016 年 5 月发表的“继绝学”的重要观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展览以促进会多年的工作成绩为主，定位于“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抢救研究成果展示，展览先期的策划得到了社科联韩凯书记等领导的肯定。



张旭会长介绍促进会对这次展览的设计思想。参会人员前排左起北京市社科联学术部石正义、社科联李副主席、学术部主任李志东，后排左起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姚进、会长张旭、学术部负责人丁春艳。



科联学术部李志东主任与促进会代表们在仔细研究关于展览的设计方案



促进会参会人员探讨展览设计的可行性



讨论展板的小样效果图



促进会展览负责人白枫向社科联王彦京副巡视员和社科联李副主席等人解释选择展览图片的初衷

会议期间，促进会成员还参观了社科联面向学会组织新建成的信息开放区，开放区可承接 40-50 人的活动，信息开放区具有多媒体功能，提供电脑联网设备以及先进会议设施。



王彦京老师向促进会成员介绍社科联的信息开放区，并欢迎我促进会前往举办相应的信息交流活动





“中国梦：协调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 学术前沿论坛会议纪要

2016年10月29日，我促进会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代表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参加了主题为“中国梦：协调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学术前沿论坛讲座，会议主要研究了在中国现在的经济转型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未来将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会议由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韩凯同志主持。



韩凯书记主持学术前沿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市社科联沈宝昌主席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韩昱副部长致辞：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收入差距大、区域差距大提出了解决方案：立足实际，重视内在联系，下功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长征净胜，迎合国家战略需求，对国家提供理论资源和智力支持。



北京市社科联沈宝昌主席致辞



北京市委宣传部韩昱副部长致辞

专家学者的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如何科学看待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有关问题”，研讨经济转型期，信贷和债券风险以及国外的中国崩溃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小康社会的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从互联网文化发展的视角，研讨法治是职业道德、合理和合情不可统一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金盛华：“找回中国人丢失的幸福感”，研讨从中国经济增长，幸福感下降等课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王炳林主任：“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探讨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相统一的观点；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室张希良主任：“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管理问题”，围绕利用大数据资源、高科技手段来解决能源利用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刘彦随：“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机遇与挑战”，提出城乡发展的问题，只谈发展不谈保护只会导致城乡失调。

赵玉超 供稿



【学界文摘】 Academic Article Abstracts

冯骥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

2016-10-20 中国书画名家俱乐部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尤其那些最驰名、最响亮、最惹眼、最具影响的——从名城、名镇、名街、名人、名著，到名人死后的墓室和名著里出名的主人公，乃至列入国家名录的各类各种文化遗产等等，都在被浓妆艳抹，重新包装，甚至拆卸重组，再描龙画凤，披金戴银，挤眉弄眼，招摇于市。

那些在“城改”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聪明地发现，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已经拆掉的无法复原，没拆的虽然不再拆了，但也难逃厄运——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更糟糕的是被世人称作“最后的精神家园”的古村古镇，也在被借名“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各类商铺、旅店、农家乐、茶社和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的天堂”；在这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有，导游讲的故事传说不少是为吸引游人而编造的伪民间故事。至于各种名人故居，大都是找来一些与其主人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瓶老壶、文房四宝，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摆一摆，好歹布置个模样；没人拿名人的人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还有那种原本安慰心灵的寺庙，不少处竟成了世俗的闹市。至于种种文化遗产，更是这种热热闹闹重新“打造”的对象。其中的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本土气质和个中独特的精神都到哪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的快餐文化，用不着太认真。那么，就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

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动不动大打出手，甚至背剑上房。他们好像都活在时光隧道里。虽然身着古装，发型和配饰却像时尚名模；没有确切的朝代与地域，一切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



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有个老样子就行，或者愈怪愈好，历史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的名义，一个空袋子，任什么乱七八糟、炫人耳目的东西都往里边塞。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再滥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

经过这样的粗鄙化的打造，在人们眼里，古村古镇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是名人在世时住过的几间屋子，庙宇都是烧香叩头却不知灵验不灵验的地方，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全离不开男欢女爱，全不正经；没有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美感。我们不是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挂在嘴边吗？如今国人从哪里能够感知这种博大精深？只能去一座城市才有一个的博物馆吗？

文化不精不深，怎样可能“做大做强”？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诗宋词、维也纳的音乐、俄罗斯文学和美国电影。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地提高。

问题是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放肆的粗制滥造，这种充满谬误、以假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轻薄、空洞、可笑、庸俗，甚至徒有虚名，一边有害于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一边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我相信，在这样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己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如果我们不再深爱和敬重自己的文化，再伟大的文化不也要名存实亡？到底什么动机与力量使这种潮流正在变本加厉？我想应当一句话戳穿，即以文化谋利。为了赚钱发财，为了 **GDP**。**GDP** 是衡量政绩的尺度——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与症结之一。

任何事物进入市场，就不免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己。但调整是科学调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取经济利益，就像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能破坏生态。文化更具特殊性。因为文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精神功能。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热销、票房、上座率和收视率成倍增长，为了市场人气攀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 **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精神的准则。即文明的、知识的、道德的、真善美的准则。这准则也是文化的尊严，这尊严一旦被践踏被玷污，文化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还会糟蹋人的精神。

由此说，问题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赚钱，而是糟蹋文化来赚钱。还有比这样赚钱更无知、更野蛮吗？

当社会文明素质上升时，愈美好的东西愈有市场；当社会文明素质低下时，愈鄙俗的东西愈有市场。为什么我们为赢得市场和收视率就去迁就低俗，甚至不惜糟蹋我们的文化？

我们是否听到我们的文化正在呼叫：不要糟蹋自己的文化了！

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声音。



玉龙情殇：殉情——纳西人婚恋的另一面

2016-08-09 杨福泉

丽江—— 今日中国浪漫之城 曾是世界殉情之都

许多人怀揣着“邂逅”一段浪漫的想法前往丽江，希望在那里能有一场铭心刻骨的邂逅。然而，你是否知道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惊世骇俗的绝世情殇史，也发生在丽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漫漫岁月中，无数纳西族年轻情侣雍容盛装，面对大雪山长歌一曲“殉情之歌”《游悲》，慨然殉情。高频率发生的殉情不仅成为纳西族历史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一种蕴含着多种复杂因素的奇特的文化现象。



长江上游金沙江环绕着“纳西古王国”，纳西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都在这里上演。图/徐振欧

殉情这一人间悲剧，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都存在，但没有哪一地方和哪一个民族像纳西族这样惨烈严重，在纳西族中，殉情悲剧孕育出了一种可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殉情文化”。因为这种神秘的殉情风尚的存在，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殉情悲剧最为严重最为集中的区域——丽江，就被中外人士称为“世界殉情之都”、“亚洲自杀王国”，神秘的纳西族因此更蒙上了一层诡异奇谲、扑朔迷离而又凄伤哀艳的神秘色彩。

群体殉情看来是相沿甚久的一种风尚，东巴经第一部殉情悲剧文学作品《鲁般鲁饶》中就描述了在高山上放牧的90个牧羊小伙子 and 70个牧羊姑娘集体去殉情的故事。在近代，殉情者大多是一对一双，但三四对乃至七八对情侣一起殉情的事也经常发生。



纳西族无数美丽的神话、史诗、传说和故事，是由他们的祭司东巴用自制的竹笔、墨和东巴文写在自制的古色古香的纸上。图/杨福泉

1723 年，一道爱情无法逾越的鸿沟

大量的研究表明，纳西族众多的殉情悲剧发生在清雍正元年即公元 1723 年后的漫长岁月中，并蔚为一种社会风气。1723 年丽江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所能搜寻到的关键词是“改土归流”。这项带有改革性的政治制度在推广的过程中，与纳西族原本率真天成、任心适性的社会文化习俗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竟至于成为让一对对不能长相厮守的纳西情侣竞相情死的主要导因。



这些鲜活欢快的生命，为了爱情也许可以从容赴死。图/车文龙



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政权以当时满汉的生活方式和在清代已被统治者异化的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衡量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实施“以夏变夷”政策，硬性包办婚姻、孩童订婚、封建家长制、三从四德、贞洁观、纲常礼教等也强制性地输入到丽江纳西族地区，纳西族的青年男女，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们产生于雪山大江、蓝天丽日下的爱情被禁锢，更致命的是，他们如此自由的爱恋，在 1723 年之前，至少在元明之前，是奔放热烈，不受禁忌的。

“那个时候，男女想好可自由自在了，男女都像出窝采花的蜜蜂一样，想飞哪一朵鲜花，花儿也会温顺地奉献花蜜。男女青年围拢着火塘火，他们在高山牧场上自由地恋爱，自由结合，星星观看着人间男女青年的欢乐，也高兴地眨动着眼睛。”（引自老东巴和正才讲述，木春丽翻译的《殉情民俗的来历》）。

1723 年后日益强化的包办婚姻制度和与其相应的封建伦常观令纳西族在强制性的移风易俗政策冲击下形成了二元婚恋形态——“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这一二元婚恋形态成为导致殉情诸多原因中的核心部分。在过去的纳西族社会中，婚前的青春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青年男女可以按传统古规自由地恋爱，自由地在一起游乐嬉戏，是人生束缚最少的时候，而一旦进入包办婚姻，就标志着一生的自由和快乐的结束，意味着与自己相爱的人永远分离，意味着向过去自由快乐的青春时光的永远告别。特别对于纳西族妇女来说，结婚更是一种沉重的负荷，她们从此将承担起家庭的重负，置于封建礼教的几重压迫之下。自由的青年时代与结婚后的生活成为一道快乐与苦难的分界线。殉情，就这样成为了纳西族青年悲剧性的选择，并愈演愈烈，渐成风气。



夏天的牦牛坪，绿茵茵的草甸上，马在草丛野花中悠然徜徉，然而这个美丽的所在也是一个著名的殉情地

图/杨福泉



雍容就死，为爱情，也为友情

一些研究自杀之谜的论著，都讲到了“自杀的脆弱性”，自杀者在自杀前一般都“垂头丧气，情绪低落，郁郁寡欢，思维迟钝，食欲不振，体重下降，人格解体，注意力分散。”而许多纳西族青年男女的殉情事例却并非如此。殉情者在决定殉情后情绪镇定，家人和朋友大都看不出其精神状态有什么异常。殉情者十分平静甚而乐观地进行殉情前的准备，择日子，置办衣物、吃食和装饰品，秘密地向知心朋友告别。死前浓妆盛服，长歌曼舞，并在殉情之地搭上布棚，饰以鲜花青枝等，以十分浪漫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从容含笑而死，有的甚至以吃毒、滚岩、自刎等痛苦极大的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从容赴死的原因也是那种不畏死的精神气质，为情为义而殉身的心理动力。



茶马古道上著名的金龙桥上，不少殉情者在此跳入滚滚金沙江。图/杨福泉

在纳西族的殉情习俗中还产生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殉友情式的自杀，某个人如果决定殉情了，有的便会向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诀别。于是就往往有友情甚笃的朋友决定和密友一起死去。这种殉友情式的自杀往往以女性为多。在拉市、泰安、大东等地都发生过这种特殊的殉情事件。

神秘的诱死幻境——玉龙第三国

海拔 5596 米的玉龙雪山是长江南岸第一高峰，它雄峙在纳西古王国，被成千上万的纳西情侣视为青春生命和爱情之归宿，他们相信山中有一个美丽绝伦的灵域净土——玉龙第三国（纳西语称“雾露游翠郭”），那里有一对爱神情侣，他们骑红虎驭白鹿，率百兽千禽，风中弄弦，云里作歌，不停地呼唤着人世上悲苦难脱的有情人。



海拔 5596 米的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圣山，也是纳西人的情殇之山。图/杨福泉

这是一个殉情者所向往的理想乐园，它是一个只能由爱情和青春生命所拥有的幻化世界，只有殉情者才能去到这个地方，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地相爱，殉情者多为 17 至 22 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男女，刚好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生命在那里永远年轻，不会衰老。这个理想世界成为殉情者所向往的一个灵域圣土，成为殉情的一个重要动因。多少年来，无数殉情的青年男女慨然赴死，想要寻找的正是这一个可以彻底摆脱人世间的恶浊苦难的理想乐土。

玉龙第三国成为纳西族青年过去普遍信仰的一个理想国，玉龙雪山上不少风景优美之处便成了殉情发生最多的地方。其他未直接去玉龙山上殉情的年轻人，也要找一个风景优美，能见到玉龙雪山的地方“雍容就死”。甚至有过跑到玉龙雪山深处去寻找这个理想国的青年男女，在雪山上呆了数年才回来。20 世纪 70 年代都还发生过这种痴迷于“雾路游翠郭”的情侣去寻找这一乐土的事。

解密爱情游魂的神秘呼唤

留居丽江多年的美籍学者洛克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殉情者为游魂召唤的奇特现象：

“在用于为殉情者举行的仪式的书（指东巴经）中，记载有很多被殉情的游魂所引诱而随他们去殉情的少男少女们。书中说，有三个年轻的牧人，当他们在寂静的山上放牧羊群时，他们听到了四个殉情姑娘的游魂所唱的神秘的歌和她们所弹奏的口弦声。于是，他们一下子感到了孤苦，决定随这些情死鬼的游魂去死。他们每人把绳子拴在自己的脖子上，那四个殉情女子的魂走过来把他们的绳子拉紧了。

“这四个精灵使他们在临死前看到了种种幻象，他们相信山风的呜咽是那个已殉情的美丽女子所发出的孤独叹息，他们在这呜咽叹息声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孤苦凄凉。他们决意要和这些殉情的鬼魂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那个永恒的快乐之地，随风一起漫游。



一棵殉情树，纳西老歌手阿燕菊曾目睹一对年轻情侣在此自缢殉情。图/杨福泉

“我们又从书中得知，有个放牧的女子叫‘般曹司沛咪’，她常常在挤牦牛奶的地方的一棵云杉树下睡觉。有一天，她听到了爱情游魂们哀怨的歌唱和呼唤，她一下子就起了离开这个世界随她们而去的念头。她把奶桶上的皮绳解开拴在云杉树上，刚要想自己结绳环吊死，那些游魂已经过来帮助她结好绳环上吊而死。



▲用于超度殉情者亡灵的仪式“哈拉里肯”的木牌画，上面绘有殉情鬼等形象。图/杨福泉

这些蕴含着浓郁的神秘色彩的种种传说和殉情事例与纳西族殉情悲剧的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封建礼教在丽江不断强化后造成的种种人生痛苦使过去曾有过青春的快乐自由的年轻人极易产生忧郁、悲哀、孤独等情绪。郁结心头的忧伤悲哀情绪一旦与精神性的信仰等相融合，就极易触发那种离弃红尘，向往死后世界的念头。纳西族有很深的自然崇拜信仰传统，此后在信仰领域里又产生了一个殉情者的神秘乐土——“雾路游翠郭”（即人们熟悉的“玉龙第三国”）。这个山中的爱之乐土在众多殉情文学作品中被浓墨重彩地渲染描绘，代代相传，终究成为对殉情者有极大诱惑力的死后世界。这种深深的山中灵界信仰是形成那种在高山密林中容易产生轻生弃世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纳西族民间认为殉情者是受了情死鬼的诱惑的说法十分普遍。据说这种诱惑往往发生在山高林深的地方。所以，在游舞丹（殉情之地）唱歌弹口弦仍是纳西族的民间禁忌，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样做会招引殉情鬼来引诱你去死。



据不少目击殉情者讲，在殉情者的遗体上都有发现口弦，甚至有嘴里含着口弦死去的
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笑对死神的纳西女子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大师杜尔凯姆在他的名著《自杀论》中用不同国家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了女性的自杀率远远高于男性。

在纳西族的殉情事件中，女子殉情的人数也远远超过男子。据笔者多年在丽江县乡村的调查所知，在过去所有有殉情悲剧发生的地区，女性殉情者都远远多于男性。女子比男子更倾向于殉情，殉情的决心也比男子更为坚定。

据一些目击殉情者的人讲，从死者自杀的方式看，有不少是男子先死，然后女子再自杀。因为女子担心男子临死动摇而放弃一起死的念头，因此设法先叫男子死，然后再自己死。如白沙乡开文村有一对殉情男女，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时，见男子高吊树枝上，女子则靠在树上，面有笑容。男子脸上有火燎而起的泡，明显可以看出是男子先死，女子用烟火试探他是否已死，然后自己才从容满意地自杀死去。



这是生长在玉龙雪山的殉情者喜欢用来结束生命的草乌。图/杨福泉



大东乡某村一对情侣相好数年，但两人从小就被父母作主与别人订了婚。那男子的婚期早于女子。于是，两人约定在男子娶亲之前一起去殉情。但他俩的计划被家里人察觉，那男子在临近婚期时被家里人日夜严密看守，无法脱身。女子在约定的会面地点久等不至后，来到恋人家的屋后，在屋后一棵树上自缢殉情而死。



为殉情者举行的“哈拉里肯”（祭风）仪式的模拟场景。图/杨福泉

还有两个姑娘和两个已婚青年女子在白石山上自杀的故事。这四个女子都是当地有名的美女，两个已婚女子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其中一个的丈夫极丑陋，一个患有羊癫疯。两个姑娘也早已被家里许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这几个女子在绝望中相约一起自杀弃世，死前一起逛古城集市，还买糖果给村里的女伙伴吃，据说这四个女子还说，姐妹们，我们今天还在这里相聚，但谁知道明天我们又在哪里呢？后来这几个女子在村子附近的白石山上自缢而死。四个人都散着发，穿上了她们最好的新衣，那两个已婚的女子穿着出嫁前穿的姑娘的衣服。

当时单独自杀的女子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妇女命苦，与男人一起过日子很艰难，还不如我们死后成一家。尽管“玉龙第三国”里的爱神游祖阿主的规矩是没有异性情侣是不能进这乐园的，但我们自己去找一个尽是女子的“游郭”（高山殉情之地）吧，在那里就不必受男人的气了。

殉情是纳西人，特别是纳西女人一首地老天荒、悲风泣月的悲歌。



把羊皮披肩留在人间

“美女之乡”的老歌手阿孜咪老人曾给我看过一件她出嫁时穿的纳西妇女的羊皮披肩，这是一件如今很难得一见的老式羊皮披肩，肩头部位左右两边各缀着一个用五彩丝线精心绣制的大圆盘，纳西语叫“巴美”，左边那个象征“尼美”（太阳），右边那个象征“亨美”（月亮）。羊皮背后缀着七个或五个小的圆盘，纳西语称为“巴若”，象征北斗七星。圆盘下系着缕缕鹿皮线，象征闪耀的星光。



纳西女子双肩挑着雪域古国的太阳和月亮

老人说，你看，我们纳西女子是肩头上挑着太阳月亮，背上背着星星。第一个纳西女人衬红褒白咪是天神地神的女儿，太阳和月亮护卫着她，她用月光星光织衣服。纳西女人曾在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明福佑下有像天一样大，像地一样宽的福泽和自由。我的祖母多次对我讲过，古时，纳西女子像山上的鹿，天上的鹤和湖里的雁一般自由，可以自己作主找中意的男子，可以拒绝去父母作主给你说的婆家。女人的苦命是后来被“官府”压制而造成的。

正是由于羊皮披肩象征着纳西女子曾经的自由和尊贵，殉情的纳西女子都会把羊皮披肩完好地留在人间。



民国初年的绣花鞋，紫缎绣花，丝、皮质，牛皮底，是母亲为女儿精心准备的嫁妆，但姑娘却很可能穿着它们与情郎殉情。

达坞村老歌手阿淑咪告诉我，她的曾祖母曾在白石山上目睹过一对殉情者，女子在殉情前把自己穿的黑色羊皮披肩折叠得好好的放在一旁。阿淑咪的祖母也在白石山上看到过一对为想保持死时容颜不变而吃水银自杀的殉情者，女子也是把自己的羊皮披肩齐整地放在一个竹篮上。身上穿着结婚时的新衣服，戴着各种首饰，散着头发，头上插一些野花。两人死前用白麻布和青松枝搭了漂亮的“游吉”（殉情之房），上面点缀着各种野花，两人并排睡在一张用树枝搭的床上，上面铺着厚厚的青松针。

无数鲜活生命谱就的哀歌

纳西族的殉情是在歌与诗中完成的人生悲剧，在民间也产生了脍炙人口的殉情悲剧文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鲁班鲁饶》和《游悲》。兹录一段以做结尾：

《鲁般鲁饶》中爱神游祖阿主与构土西公对开美久咪金的呼唤

开美久咪金！
你痛苦的眼睛，
来这里来看一看草场上的鲜花！
你疲倦的双脚，
来这里踩一踩如茵的青草！
你痛苦的双手，
来这里挤牦牛的奶汁！
你来吧，到这云彩缭绕的雪峰中来！
来这里吃树上的野蜂蜜，
来这里饮高山的清泉水，
来这里把美丽的野花插满你的头。
用红虎当你的座骑，
用白鹿耕耘山中的地。
来吧，你在这里挤宽耳朵母鹿的奶，
你在这里织飘飘的白风和白云。



殉情之歌《游悲》在一片凄惻哀愤的悲剧情调中，亦突出地表现了纳西人这种重情轻生的民族个性。贯串在各种不同的《游悲》中的一个突出共同点，就是纳西族青年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作品中主人公真挚而凄哀的深情，不惜以生命来殉爱之理想的痴心感人肺腑：

“哥如被抓去，妹变白蝴蝶，白天去找你；哥如被抓去，妹变萤火虫，晚上去找你。蓝天比翼飞，生死不分离。飞到玉龙山，融为玉龙雪。”

“不能成一家，同化一片霞，不能成一对，同化一缕烟，烟霞随白鹤，飞到玉龙山。”

“绸子绣山茶，花红叶儿青，匹头裁哥衣，匹尾裁妹衣。树上茶花艳，霜打花枯萎，衣上茶花艳，永远红生生。共穿一匹绸，死在一座岭。锦上飘白雪，飘落柏树上，柏叶变为鱼，白雪化为水，鱼水来相会。冬季才有雪，衣上雪长存，共穿一匹缎，雪山找爱神。”



来自丽江鲁甸山区的老东巴和开祥（中）是吟唱殉情长诗《鲁般鲁饶》的高手，他沉洪苍凉、声遏行云的歌声，唱尽了纳西古王国的绝世情殇。图/杨福泉

编辑：田甜



纳西族口头传统特征刍论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6-11-14 作者：杨杰宏

提要：纳西族口头传统源于纳西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依靠世代口耳相传、集体再创造而生生不息，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外来文化影响及语言区域的不同也会导致口头传统的变异，最突出的是丽江、永宁两个西东方言区；口头传统的变异首先是通过变异的语言传入的。东巴（达巴）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传承中坚，东巴仪式中的口头表演是主要的传承方式，通过仪式表演，其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得到了紧密、有机的统一。

关键词：纳西族；东巴；口头传统；地域性；仪式表演

纳西族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 31 万，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因创造了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化而著称于世。纳西族口头传统源于纳西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依靠世代口耳相传、集体再创造而生生不息，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

一、口耳相传中形成的口头表达艺术

口头传统又称口头表达艺术，这是因为口头传统的基本载体不是文字而口头语言，口头性是口头传统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这种口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创作是依靠口耳相传来完成的。虽说纳西族东巴经是有文字的宗教经典，但不可忽视它们最初的本源是口头流传的，是对口传经典的忠实记录和再创造，同时，这些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并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于仪式上的吟诵，属于半口传的口头传统文本。与东巴经相对应的达巴经，迄今为止也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其内容、体例大致与东巴经相差无几，说明达巴经与东巴经在同一氏族时期中衍生而来，且最初以口头形式流传。

丽江这边的东巴虽有东巴经书，但这种经书是为诵经时提醒记忆而书，可以说是口诵的记忆线索。口头念出的经文不一定一一在经书中相对应，里面的东巴象形文字只是起到方便记忆的作用。如在卷首画一虎头，念出来时并不只发一音，而是发出“阿老蒙什尼”五个音节，其中的“老”意为老虎，以关键音标全句。全意为远古的时候。为什么以虎头引申为远古？纳西族先民在历史上有过虎图腾崇拜，是所有图腾崇拜中较早的民俗信仰，故以虎头表年代久远。与鲁迅先生说的最早的文学派别是“杭育杭育派”一样，口头传统一开始就是以口头的形式存在。真正的东巴大师以记忆惊人，能诵会解而著称，有些著名的大东巴可以把上百册经书倒背如流，引用自如。他们对传习的弟子的要求也是博闻强记，这样出去做法事就能轻松自如，不必背上沉重的经卷行囊，这样也会被同行所讥笑。有些口头传统本身是在劳动中产生，在漫长的无阶级和阶级社会中，很少有机会学习文字经典，他们的生产生活经验、科学知识大多从祖上口传而来，同时，大量的口头传统随时代的发展而应运而生。如阿一旦故事，是在明清之季产生的；栽秧调、犁牛调只会在纳西族进入农耕社会后才产生；哭情调是在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渗透到丽江后才有的。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合为时而兴。口头传统的口头性因其迅捷、简洁、通俗的特点在民间获得了极为深广的表现空间及生命力，并且在口头传统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口头性是通过说讲、诵唱或说、诵、唱相结合而实现的。东巴大师在宣讲经义或主持仪式的诵经时，其语调并非一成不变，单调乏味，而是结合史诗中具体的情节，人物个性，时而娓娓而叙，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沉吟低咏，这种似唱似吟，讲唱结合的形式称为东巴唱腔，尤其中结婚调、丧葬调中更为突出。《鲁般鲁饶》是一部爱情悲剧长诗，东巴诵唱此书时，一般安排在夜深人静之时，也防止青年男女听到后相互仿效。这部长诗的艺术魅力不只是表现在内容情节上，也是通过东巴声情并茂、哀婉动人的诵唱有着密切的关系。好多青年男女不顾禁令及深夜霜露，偷偷倾听，为男女主人公的忠贞不渝而感动，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情境界而折衷悲叹，一次次为身临其境、细致入微、声情并茂的说唱打动心扉，无语凝噎，潸然泪下。真正的经典是难以磨灭的。另外，起房调、赶马调、犁牛调、栽秧调等劳动歌更是歌中的文学，文学中的歌。歌因文学而丽，文学因而传。甚至可以说，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少了口头传统这一块，就失去了文化重心而逊色不少。

二、口头创作、传承是以集体的形式而实现的

集体性与口头性相辅相成，这种口头创作、传承是以集体的形式而实现的。好多口头传统流传到现在，并不知道这篇长诗是谁创作，这首民歌是谁首创，因为这无从考证，也非个人所为，它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产生后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予以了再创造，再加工，使其一次次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而源远流长。首先，口头传统表现在它所表现的主题上。歌以咏志，文以载道，诗以传情，这些口头传统表达的主题是时代价值观、伦理道德的载体，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审美情趣，表达了民族集体的价值观、道德观。如从东巴史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纳西先民经历过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的发展脉络；从阿一旦的故事中了解明清时期丽江的社会状况；从谚语中领悟到纳西族民间对农业、畜牧等生产知识的总结。这些都是集体智慧、集体经验的提炼及升华，绝非个人所为。其次，这种集体性还表现在受众群体上。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没有听众就失去了歌声。任何口头传统因受众而存在，它的生命力也体现在广大受众的态度、感情之中。任何一部口头传统作品只要失去了群众的认可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人在口头传统中毫无作用，相反，许多著名民间歌手、艺人、祭司在口头传统的创作、传承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纳西族的东巴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大东巴，就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通晓口头传统艺术、熟谙仪式规程，同时也是社区集体的代言人，在民族群体中享有崇高威望。有些仪式、有些口头传统作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它的演唱、主持、传承往往是由这些民间艺人、歌手、祭司完成的。一般的民众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口头作品，那么繁富复杂的歌舞演唱等技能。同时，血缘传承、师徒传承也决定了口头传统传播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个人作用与集体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如果一个歌手一味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他再高深的知识或技能也是派不上用场的。一个优秀的民间歌手或创作能手是懂得如何反映听众的心声，表达他们的感受，他的威望是不断地通过与听众的互动而实现的。如有些口头传统是二者互动形式来实现的，阿丽丽、喂默达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合；时授调是男女二人对唱。同是丧葬调，起房调，结婚调，在不同人家，不同时节，不同人群中就有不同的内容。第三，口头性与集体性的结合突出了现场感，口头表达具有即时性，它的载体是心灵的感受。一个口头传统传承者如果语言没有文采，语调没有色彩，不注重调动听众的现场气氛，他是无法赢得人心的。好多有名的民间歌手或



东巴祭司，在进行仪式或表演过程中，无不在渲染现场气氛，突出当事者的情境。这种气氛与情境是集体的参与、互动分不开的。祭天时，在滚滚浓烟中，在抑扬顿挫的诵经声中，在严格的祭祀仪程执行过程中，现场的气氛是极为肃穆庄重的。每一位祭天群中的成员都从心底认为他们的诚心可以通达祖先灵魂处，可以通达天庭中的神灵。这种集体行为对个人不合群的言行是严加禁止的。这种现场体验绝非那些展演性质的宗教活动所能比拟。就是说这种现场性与集体的传统认同，集体的参与、互动紧密相连。同时，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沉淀下来的集体意识、集体表象对个人的思想意识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这种集体知识背景而独存。

三、文化传播带来的地域差异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是一个民族，因所处地理区域、气候、周边民族不同，原来同祖同脉的文化习俗也会产生变异。即使是同一口头传统文本，在不同地域就会有不同的变异情况。纳西族口头传统的地域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丽江与永宁两个地方，如两地都流传有口头传统经典——《创世纪》，但二者版本在内容、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故事范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以说是小同大异。丽江西部分方言区的东巴经与东部方言区的永宁达巴经虽同为原始宗教，大多以自然崇拜内容为主，但东巴经更多是维护父权等级、强调汉式婚姻的正统性，达巴经则讴歌、敬奉母亲、女性，强调母系家庭的正统性、和谐性。这在其它的口头传统作品中也反映出来，如永宁地区流行的《情歌》、《献给母亲的歌》多与尊崇女性传统有关，丽江地区的《殉情调》、《结婚调》与丽江山文化渗透进来后发生的文化变迁有关。同样是赶马调，丽江与永宁也有不少出入，因为所居地域不同，赶马的路程不同，周边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具体的内容也产生了差异。丽江的赶马调是从马的来历唱起，然后一直随马帮的所经过的地方，如拉萨、永昌、普洱、大理、昆明、北京，讲述如何买办商货、进行交易、购置结婚用品的过程。这与丽江特有的茶马古道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地方口头传统的差异性属于同源异流，除了两地的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相关外，与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有内在关系。相对说来，永宁地处藏区、彝区之间，主要受藏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影响较大，喇嘛教的当地的文化地位明显超越了原生的民族宗教；而丽江则受汉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雍正元年（1723年）实行改土归流后这一影响呈现加剧趋势，形成了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汉文化传播圈。

四、不同时空语境中的文本变异性

一个口头传统题材在不同时空语境中有着相应的变化，甚至异化，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口头传统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与历时性两个方面。就地域性而言，不只是距离相隔较远的地区之间有不同的版本，就同是一个方言区的同一民间作品，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如在丽江广为流传的《达勒阿萨命》的故事，在丽江城镇、乡村、山区皆有不同版本，如达勒阿萨命的出生地或变成达勒村，或变成木老爷家；其身份也或变成达勒村的村姑，或变成木老爷的三女儿。《金沙江与玉龙山的故事》也是有多种异文版本，如有的说金沙江姑娘是与玉龙雪山相爱而折东而来；另外版本说她是向往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朝东而来，玉龙与哈巴是天父派来阻拦金沙姑娘的。同是《创世纪》，永宁纳日人与丽江纳西族的版本也是小同大异。这种变异性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因口耳相传，地域相隔，年代久远，在大致内容主题不变的前提下，一些具体的情节、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创世纪》中。崇仁利恩现衬红褒白命都曾与魔猴有过不正常关系，并分别生下了后代，东巴经中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否定，并以最后杀死魔猴及其后代而告终；永宁纳日人的达巴经中也有类似情节，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男主人公曹志鲁依与年兆美分开期间都与魔猴发生了关系，并生下了猴人，但他们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用开水烫掉了猴毛，由此变成了人类。这种变异与永宁与丽江两地不同的婚姻制度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二是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符合实情的再加工、再创造。如有关丁巴什罗的传说中，有的传说是突出了丁巴什罗神通广大，有的是受屈于藏传佛教或苯教的神通之下。前者是在受藏文化影响小的地方流传，后者在藏族文化影响大的地区流传。

三是原型不在本地，是从外地传入的，对外来的口头传统进行了本土化处理。这在早期在东巴神话中较为突出，主要是受藏族的宗教文化影响；后期则在传说、故事、童话方面更突出些，明显受汉文化的影响。譬如灰姑娘型、地主财主型、两兄弟型、呆女婿型、机智人物型、巧女型等类型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与改土归流后大规模吸纳汉文化的社会背景分不开。

四是受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兴阶级斗争，无中生有地炮制了大量的符合当时政治情境的“民间文学”。如上述的达勒阿萨命的传说，在东巴经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可能这是最早的原型，后来把女主人公的家庭或变成贫苦家庭，或成为贵族公主，目的是为了突出阶级对立的尖锐性，不可调和性。阿一旦故事类型中也有些是后来补充进来的“现代版”。有个老学者曾回忆说当时还在读中学时，上面要求搜集口头传统，其实是集中在一起编写口头传统，搞“文学大跃进”，一个月就编出一本集子。这样的“神话”、“传说”大多遭到了民众的唾弃，但有些至今仍在“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五、东巴成为纳西口头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

首先是口头传统内容的传承。口头传统是民族最初的教科书，它讲述的是民族的历史，人类的起源，回答的是人类灵魂归宿，生存死亡的哲学问题，传授的是生产生活经验。这些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文明的基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口头传统历经上千年同，仍能薪火不断，源远流长。纳西族口头传统与东巴传统文化在概念范畴上存在着交叉重合，东巴——东巴经——东巴仪式——东巴文化，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核心构成，深层影响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譬如创世史诗——《创世纪》中天地万物的形成，崇仁利恩上天求婚，下凡繁衍人类，诞生藏族、白族、纳西族三兄弟，祭天的开始等内容，因与祭天、祭祖、婚丧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得以代代相传；阿一旦故事因其强烈的现实性、风趣性使百姓喜闻乐见；谚语、迹语以其简练的语言、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不少民间歌谣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在民间一直经久不衰。

主体的传承是指口头传统的主要传承者，即口头传统的讲述者、集成者的继代传承。口头传统的受众对象是整个民族的大众百姓，但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记忆超人，口才出众，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的民间文化的代言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代言人由东巴来承担。一个东巴往往是一个地方民族文化或口头传统重要的载体。这样也意味着，他的去世就会有不少口头传统经典无疾而终，随风而逝。民间文化传承者的传承本身属于民间



文化传承重要的内容。往往有这种情况：东巴集中的地方，民间文化就异常丰富，传统文化生态也保留完好。一般来说，这种民间文化主体的传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血缘传承，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二是师徒传承，师傅选徒或徒弟选师，皆以为人，才能、天赋为重要标准；三是多元传承，即包含了父子传承、师徒传承等多种传承途径。父子联名制、东巴师徒联名制就是这种传承关系的佐证。一个大东巴往往要转承多个德高学深的东巴才能有所成就。

六、仪式中的表演

从源头上看，纳西族口头传统源于人类早期社会，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流传至今的不少口头传统文本中还保留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的原始宗教遗留。这些宗教观念往往通过与之相关的宗教仪式行为得以实践与宣扬。东巴教是纳西族特有的民族宗教，东巴经、东巴仪式成为纳西族口头传统最主要的载体。东巴教种类繁多的经书，繁杂庞杂的神灵体系为东巴仪式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及内容，同时也带来了分类难题。西方学者洛克把东巴仪式分出 122 种，并分别纳入“纳西宗教仪式”、“较小仪式”、“丧葬仪式”、“特殊丧葬仪式”、“延寿仪式”等五大类。

东巴仪式是借助神灵故事来宣扬东巴教的主旨，其仪式行为又往往与仪式表演融合在一起，通过文本口头叙事、东巴舞蹈、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游戏等多元艺术表演形式的融合，给受众者以多种艺术审美感受、体验，从而达到“神话是真实的”的叙事目的，可以说，东巴叙事传统中的神话叙事同仪式叙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譬如《丁巴什罗传略》是在东巴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主要经书，主祭东巴在仪式中以口头叙事方式讲述东巴教教祖丁巴什罗一生的传奇故事，从他的出生、成长一直到杀魔除妖，最后葬身毒海的整个过程。

小 结

以上所提到的六个特征是相辅相成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整体特征，这些特征中内在的逻辑线索是口头性。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都是以语言艺术作为载体的，这是口头传统与其它民俗事象最突出的区别。同时，口头传统内部因体裁分类不同，其语言特征也产生了相应的差异，如神话、史诗语言中的神性，故事语言的起伏性，传说语言的传奇性，歌谣中语言的简洁明快性，谚语、谜语中语言的哲理性。再者，语言区域的不同也会导致口头传统的变异，最突出的是丽江、永宁两个西东方言区；同样，同属一个方言区，但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到口头传统，当然，这些变异了的口头传统首先是通过变异的语言传入的。最后，语言天然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地域性，而东巴仪式通过观念实践使口头传统的这些特征得到了紧密、有机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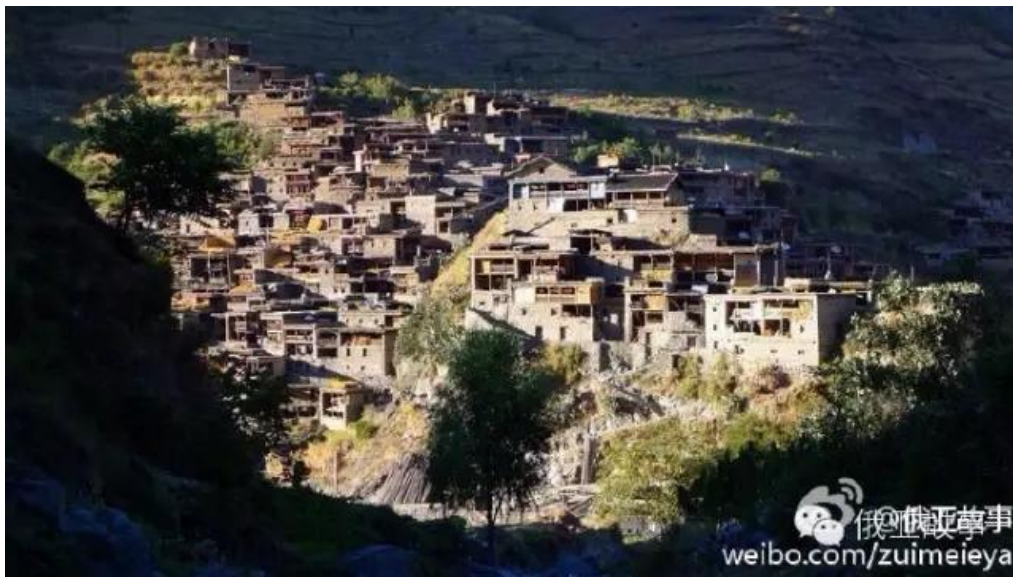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ADCA 第 13 期【学术文摘】节选



纳西原乡俄亚大村

2016-04-28 和继全 / 俄亚故事

上世纪，美籍探险家、学者约瑟夫·洛克游历我国西南地区长达 27 年，三次进入木里，却因山高路险与俄亚失之交臂，成为了他终生的憾事之一。俄亚大村是中国罕见的保持着完整原真文化的古村落，有着 400 年左右历史，距木里县城 298 公里。这里处于川滇两省的木里、稻城、玉龙、宁蒗、中甸 5 县的交界处，四周被重重高山和龙达河、无量河、金沙江环绕，由于自然环境的极度封闭，这里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原汁原味的纳西古风。



俄亚纳西人的主体是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派驻此地的纳西军队后裔，当时的首领“木瓜”传说是丽江木土司的管家，随行的有东巴祭司、工匠、牧人等，这些家族的名号至今沿袭着祖先古老的职业。而他们选择的居住地——俄亚大村，凸显着军事要塞的特点：村庄依山而建，毗邻龙达河，易守难攻。进村需要通过唯一一座桥，然后还需再进入一条蜿蜒的岩道，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全村 200 多户人家平顶房屋连为一体形成蜂窝建筑群，人们通过一把独木梯爬到房屋便可通向全村任何一户人家，形成浑然一体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村的一个轴心是东巴——纳西人的祭司和知识分子，俄亚的百姓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都离不开东巴祭司，甚至面年的历法都由东巴祭司通过观天象而订。东巴教尊天法祖、追求人和神灵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个人与团体和谐、个人内心世界的和谐等和谐精神在这里得以体现。特别是人的生命之尊严在信仰体系中得以升华。

强调团体互助、合作的古代军屯精神在俄亚纳西人的生活中也是处处得以体现，他们甚至保存了最古老的炼铁技术。一直到上世纪中叶，俄亚还在用最简陋的工具，倾全村之力耗时数月采矿、建炉、伐木，用最古老的冶炼技术炼铁作为生计，这项古老技艺成功的关键在于所有人的竭尽全力。过去的俄亚纳西人所做的火镰刀金属制品在川滇民族地区最富盛名。一直到十多年前（1998 年），俄亚大村曾每户出一男丁，上百人齐心协力，经过数月风餐露宿，将一座水电站的机组从云南翻山越岭扛回来，修建起了第一座水电站，这样一种协助互助精神和团体意识，与强调自我的现代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行走在大村，碰到的每一个纳西女人无论她在路上或少劳作之余，时刻都在绩麻、搓毛线、手上永远不停息。过去她们终年都要为一家人的衣料操劳。如今，虽然工业化生产的衣物已经逐渐在替代手工制作的麻布，但麻布是依然俄亚纳西人最受青睐的衣料，在成丁礼、结婚等重大礼仪活动时作为礼物馈送，清一色的麻布衫、麻布百褶裙热然是姑娘们的最爱。因为一丝一缕编制而成的带着亲人体温的麻布本身就是温情。传统的大地、玄秘的大地、纯真的大地，俄亚大村是大地深境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人们和谐共处，生活和信仰独具特色多姿多彩，其深奥的智慧，朴实而善良的品行，以及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特异观念，令人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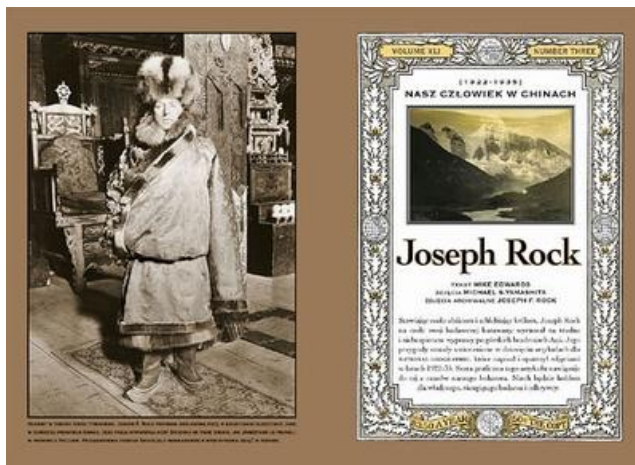




【海外文坛】 Overseas Literary Circles

约瑟夫·洛克在中国

译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997 第一期 *Our Man in China - Joseph Rock* [1922-1935]



Mike Edwards 迈克·爱德华兹 撰文 / 白 枫 译文

在经历了不断地抵抗土匪的袭击和拜见当地头人的过程之后，约瑟夫·洛克精心组织的探险队终于到达了荒蛮的亚洲腹地。他的冒险经历活生生地展现在他 1922 年至 1935 年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 10 篇文章和拍摄的一批照片中。本文试图以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风写就，并表彰一个傲慢、自大，同时又意志坚定的探险者的成就。

他看到了它，从它那儿死里逃生，并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那里的一切。

为了提防本世纪 20 年代那些专门抢劫中国边境地区旅行者的土匪，这支在山间小路上缓缓而行的马帮商队必须伪装得让人看起来像是一支入侵的军队。

马帮由 26 头骡子和 17 个人组成，并由一支 190 人的步枪卫队护送。马帮的头头举止很傲慢，更与他周围衣衫褴褛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衣着十分考究，穿着马裤、皮靴，戴着遮阳帽。他是一个白种人。

这并不是一支入侵的军队，而是约瑟夫·洛克，这位国家地理杂志的探险家，兼作家、摄影师的又一次马拉松式的远征，正行进在这片地图上尚未标明的群山之中……这里属于中国“落后的边境王国”的疆土。洛克让士兵护送他的马帮是为避免土匪的靠近。

要是土匪们能够看清那些绑在骡子身上的箱子的话，他们也一定能发现一些与这个进入他们领地的外国人粗暴相貌一样奇怪的其它东西。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洛克旅行起来简直象个皇族成员。他的行李包括帐篷、折叠床、椅子、桌子，当然还有桌布和瓷器，甚至还带了台靠电池驱动的留声机。他有时为那些牧民和僧侣们播放西洋歌剧，并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他们在听《波希米亚人》和《丑角》中那些伤感唱段时，惊讶地发出的带着笑声的嗥叫。



是的，他也随身带着一只便携式的橡胶澡盆，这是他从纽约一家著名的旅行用品商店 Abercrombie & Fitch 购买的。

洛克的性格十分复杂。他执拗而孤僻，骄傲而又自强。

洛克生于维也纳，是一个贵族仆人的儿子。他 1905 年 21 岁时来到美国，并于 1913 年成为美国公民。因此，他从来也没有摆脱掉旧时代独裁专制的习气。

他在这里经常骑马旅行。但每当他走访当地统治者时，他的开销——用“国家地理杂志”的话来说——“简直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中甚至包含这样的费用：轿夫费与四个苦力费，每天 80 美分。

因为此地没有公路，洛克出行不能乘汽车。所以，装有两根长木杆的中国轿子就成了他的轿车。每当四个轿夫把轿子落地，便从中走出穿着白衬衫和外套，打着领带的洛克，显出很有身份的样子。“如果你想在这野蛮的地方生存的话，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是个重要人物。”他一次这样说道。

这也许是对的。洛克也的确喜欢被人看重。如果他得不到在他看来是应有的尊重，通常是会大发雷霆的。一次，有个中国商人走进他的居所，没向他问候就落了座。洛克二话没说，拎起衣领就把他扔出门去。“我难以容忍鲁莽无礼的中国人，”他在日记中写到，这多少流露出他众多缺点中的种族主义倾向。

“国家地理杂志”档案中第一份有关洛克的记录，是编辑吉尔伯特·H·格罗斯温纳 1921 年所作的备忘录，其中提到，“约瑟夫·洛克先生今天来电话，问及一篇题为《寻找大风子植物》的文章。”

“我为他上述题材的一篇文章和筛选出的他的 40 幅照片付给他 400 美元。”这在 1921 年是很大一笔钱。

洛克在夏威夷从事植物学研究，他从奥地利移民后最终定居在那里。虽然洛克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他靠自己坚定的决心和信念，… 这也是他的另一性格特点… 终于成为了一名专家，甚至还在那里 … 现已成为今天的夏威夷大学 … 教授过课程。



探险途中的洛克，即便旅途条件有限，也要讲究生活的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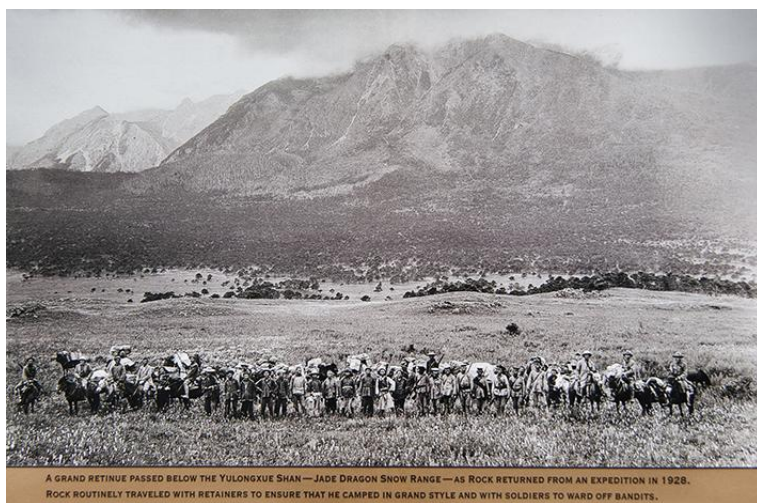
1920 年，美国农业部派他去泰国、缅甸和印度工作一年，寻找一种叫做大风子树的种子。据说这种大风子树种子的提取液对治疗麻风病有疗效，所以农业部打算在美国种植这种树。洛克不仅两次成功地将找到的树种用密罐带回美国，并且证明了他有能力在亚洲那块荒野地区生存。（遗憾的是，大风子油中的提取物被证明对麻风病的治疗效果很有限）



洛克的经历对 Grosvenor 编辑颇有吸引力，因为这位编辑当时正为“国家地理杂志”组织一些大胆开拓类型的稿件，因而他渴望能支持探险家们的工作。当时发表的另外几篇开拓类稿子还有海军上将理查德·E·伯德叙述他 1929 年飞越南极的经历，和威廉·比伯描写他于 1930 年乘深海球形潜水器打破潜海深度记录的探险事迹。

洛克投来的稿件是令人惊奇的。九篇附有照片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从 1924 年至 1935 年被陆续发表。这些文章给读者们带来一个生动而奇异的美妙王国和有关那遥远国度里的人们信息，以及那些覆盖着冰雪的山峰，这些山峰即使是地理学家对它们也很少了解。

洛克是 1923 年至 1924 年“国家地理杂志”驻中国的代表，并有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国家地理杂志协会云南省探险队队长”。直到三年后的 1927 年，这个头衔才作了改动。



洛克的探险队 1928 年返回玉龙雪山时的合影



年轻时的约瑟夫·F·洛克

从中国南部多山的云南省这个与缅甸和西藏接壤的地区开始起，洛克的探险工作向北延伸了上千英里，已经接近戈壁滩和内蒙古。

“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白种人到达过这里，”当洛克视察了青海省的黄河峡谷后自夸道。……他在自己的大多数文章中多次重复提到这一点。

《通过亚洲大河谷》是他 1926 年 8 月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他跨过湍急的湄公河，偷偷潜入这个竹林环绕的地区。在 1930 年 10 月的另一篇文章《贡嘎山的荣誉》中，他描述了在中国最高的山峰间冒着暴风雪行进的情景：“我们用冻僵的手打点起我们的铺盖和帐篷，正当我们要离开宿营地的时候，暴风雪狂怒地越加猛烈了。”洛克经常在海拔 10000 英尺的高度宿营，有时他们用更耐高寒气候的牦牛代替已经精疲力竭的骡子。尽管有庞大的护卫队，他还是在山路上遭受着土匪的袭击；而当他们在那些从囤积了多年的污物中散发着恶臭的村落中停留时，又被痢疾所困扰。

在记述遇到的困难时，他的一篇文章这样开始道，“近几个月来，很多不愉快的感觉大量地涌向我。”对他来说，这种简单句子是不常有的。

他的编辑们经常对他因离题而走了样的散文和那些冗长的手稿进行删节。“前几页中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个段落应该删除。”一位编辑对他的一份来稿批评道。

这对一个骄傲的探险家真好比是横征暴敛般的冒犯，因为他曾问及：是否可能让整个杂志全都报道他的探险活动。至少，“我希望你们每年不少于发表我两篇文章，这总是可能做到的吧”他写到。助理编辑弗里德里克·辛普奇不无嫉妒地评论到，“先生，实际上六个月内我们杂志已经发表了你的三篇文章！”



编辑们形容洛克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然而，有一点足以弥补他那暴躁如火的脾气给人们的坏印象，那就是他始终顽强、固执地恪守了一个探险家、新闻记者应该遵循的第一准则：获得你所要的一切。

“国家地理杂志”图片部主任弗兰克林·F·菲舍尔在 1926 年给洛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们最终已经有幸将您尝试“真实彩色摄影”的有关资料收集齐了。”

除了一堆笨重的手稿，洛克还寄回了一些黑白照片。格罗斯温纳相信，洛克的这些彩色照片“对杂志来说，价值几千美元。”但菲舍尔用“尝试”一词，则对此表现出了一种谨慎的观点。因为那时彩色摄影还是新奇事物，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彩色”照片，实际上是用黑白照片人工着色而成的。



东巴仪式 洛克摄于 1930s-1940s



永宁地区的摩梭人 洛克摄

与他这种“尝试”的成功相对的是一些令人不快的麻烦事。首先，出了点运输上的问题。洛克是采用 5×7 英寸的玻璃彩色干版进行摄影的，而实际上，不少这种被仔细包裹着的玻璃干版在运往中国的途中已经被搞碎了。

再有，这种摄影处理过程是极其缓慢的。为了获得色彩，这些玻璃干版要涂上一层染有桔黄色、绿色和紫罗兰色的淀粉涂层。摄影影像在达到感光乳剂以前要先穿过这个涂层。即使在明媚阳光下拍摄一幅风景照片，洛克也不得不对这种彩色干版曝光整整一秒钟。当然，洛克要拍摄的那些人物，也得面对他那台架在大三角架上的照相机，静止地站至少同样长时间才行，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曾经见过照相机。

没有什么能让不知疲倦的洛克感到气馁。事实上，洛克常常是在旅途中处理他的摄影干版。一次他写到：在一个树林里，“我们搭起了冲洗照片的暗房帐篷”。他用棉花把水过滤干净，还点燃牛粪加热盛显影液盘子，使其达到显影过程所需的华氏 65 度。他的一个助手用纸板驱赶苍蝇，免得它们碰上粘粘的乳剂层。

“把干版进行干燥处理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困难，”他 1929 年 8 月抱怨道，“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空气湿度都饱和了，… 除非能让干版尽快干燥，不然的话，感光乳剂会呈现出点状爆裂，这会使干版表面到处留下绿色的斑点。”

有时，那些质量不佳的感光涂层干脆就从玻璃上脱落了下来。

一些洛克已经显影完成的干版，在寄达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地理杂志”总部时，



也没能逃脱破碎的命运。不过，仍然有将近 600 个摄影干版被完整无缺地收到。洛克对照片内容的描述，更使其升华到令人深感奇异的程度，…… 冰雪覆盖的山峰，头戴吓人面具的舞者表演的宗教仪式 …… 这些都开始以逼真的宽幅彩色照片发表在杂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既生动又独特的对中国的初步印象。



丽江四方街市场 洛克摄于 1930s - 1940s



东巴祭司主持仪式 洛克摄于 1930s - 1940s

洛克在童年时就向往中国。在维也纳一所博物馆时，他就自学了一点中文。作为一个冒险家，他迷恋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憧憬着能够深入当地那些让人望而却步的群山，去成为“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白种人……”

然而，在几个月的旅程里，他不可避免地变得有些消沉。使他产生变化的是中国当时的混乱与腐败，也由于中国“悲惨凄苦的小镇生活状况”和成堆的“鸦片鬼”，洛克就是这样称呼那些吸毒成瘾的人。

他曾多次发誓永远离开中国，并且也确实离开过好几次。但他还是不断地回来。他就像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他也发现自己被那个“充满汽车狂热的美国”和“所谓的文明社会”所排斥。他 1930 年曾写到：“我过去的十年是生活在激动之中，这以后随之而来的单调生活，对我来说将是难以忍受的。”

洛克走访“国家地理杂志”总部时，曾走进一位有同情心的图片编辑的办公室，向他倾诉自己对云南群山的思念之情。他最后一次看见它们是在 1949 年。那时，共产党接管这一地区的日子即将来临。他觉得最好还是离开这块已经生活了 27 年的土地。

洛克于 1962 年去世。使他感到莫大欣慰的是，他至今仍然被谷路科村的人们所怀念。这是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里的一个小村，洛克曾于 1922 年在此建立了自己的考察总部，并辗转居住在这里，直至 1949 年。

当我去年来到这个小村，每一位与我交谈的老人都还记得“洛博士”（Luo Boshi），他们至今还这样称呼他。“Luo”大约就是 Rock 的发音，因为“Ro”这个音对亚洲人来说是很难发出的。“Boshi”的意思就是博士，这是洛克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尊称，甚至在“国家地理杂志”中也发现了对他的这种称呼，尽管洛克本人实际上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

村民们都是纳西族。这个民族与藏族相近，操自己的语言，在今天的云南省中大约有 27 万 5 千人。他们与汉族人相比肤色较黑，体形也较为高大。一些曾受雇于“洛博士”马帮队的纳西人显得比他们的雇主还要高，因为这位雇主站立着是五英尺八英寸。

洛克因为会治病而赢得了这些纳西人的尊敬。“当时我曾祖母病得很重，是洛博士给了她一些药，她的病才好了，”李从光这样说道，他现在住着当年洛克居住的房子，“这就是我们全家都帮助“洛博士”工作的主要原因。”



玉湖村，洛克 1930s 年至 1940s 曾在此居住。白枫摄于 1999

另一个 75 岁的老人李世君（我遇到的大多数村民都姓李）告诉我，是洛克使他在 40 年代免遭蒋介石军队的抓壮丁。洛克对当时的腐败政权相当蔑视，就象他厌恶共产党一样。当士兵进村要把年轻人抓走时，洛克把李世军藏在自己的屋里，这也可能因为李世军的哥哥是洛克的保镖，所以洛克要帮他们一个忙。



村民李进云的父亲是位木匠，曾为洛克工作。图中的地毯、木箱和工具是洛克离开中国时留给李家的物品。白枫摄于 1999

不少村民至今仍保存着洛克当年从美国带给他们的东西，或是洛克最后离开时留下的物品，比如，一把锯子，一把凿子，甚至还有牙科器具。这些牙科器具至今还被村民们用来施行一些简单的牙科手术，那些钳子、镊子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当地人拔除了上百只牙齿。

我希望能找到洛克的橡胶澡盆。可当我问到它时，村民们对此却茫然不知。



玉湖村洛克故居 白枫摄于 1999



本文译者与村民李崇光，李崇光的祖父曾在玉湖村协助洛克工作。张旭摄于 1999

谷路科村的房屋是用木头和石头建造的，它们在高耸的玉龙雪山下星罗棋布。小村子与洛克当年时相比有了点变化，现在它被叫做“玉湖村”，是根据不远的一处湖水的颜色命名的。

我是夏天到达那里的。田间，一群妇女和几个男人在弯腰收割谷物。洛克曾经提到这里的妇女通常承担大部分体力劳动，至今这个传统仍延续着。

作为“国家地理杂志”探险队的领导者，洛克第一篇文章的内容是有关萨满教祭司“东巴”的。东巴主持一些奇异而古怪的仪式，----- 跳东巴舞蹈，跃入篝火，再把手伸进着火的油中 ----- 以此来驱逐病人身体中的魔鬼。



原始东巴经文及洛克翻译工作文稿

不久，洛克开始翻译那些古老的象形文经书。这些经书记载着纳西人的历史，叙述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而这宗教仪式是植根于西藏古老的苯教传统之中的。进行这一工作时，洛克要完全依赖东巴们，因为只有东巴才能读懂象形文字。

在哈佛大学的部分支持下，他最终完成了两部含有大量注释的纳西族历史文献，和一部有 1094 页的《英语—纳西语字典》。

“洛克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昆明“云南社会科学院”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强调说，“今天我们是不能象他那样，从那些已故的东巴祭师那里获取信息的。”

纳西文化在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命运，那时纳西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东巴祭师也被驱逐。

然而，在今天相当宽松的中国社会生活里，学者们正准备深入探索这个文化。政府官员们也表示，如果纳西人愿意，也可以重新信仰他们古老的宗教。洛克记录和研究纳西学的努力如今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以致于云南省正计划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



1922 年洛克是 38 岁，当他在谷路科村定居时，认为这个村庄“如果不是如此赤贫的话，可以称得上是个迷人的所在。”

村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除了为“地理杂志”作探险工作，洛克还收集植物标本。这里的山峦遍布着各种杜鹃花，还生长着许多其它植物，这些植物或许在美国也能很好地生长。像各种针叶树、蕨类植物、以及某些种类的花，它们可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却能赢得学者们的兴趣。



洛克雇佣的纳西村民在玉湖村洛克居所院内，协助做植物标本的分类工作。 洛克摄于 1923

在“地理杂志”的赞助下，六万种植物的标本被夹在纸中运达美国。它们被转运到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松尼安研究所”后，供各大学和植物研究所作科研之用。洛克把植物的种子包藏在研细的木炭里以防止其干透，然后运往美国农业部（他的不少杜鹃花至今在旧金山、西雅图和英国的花园里长势良好）。他还运回 1600 种鸟类标本供美国的鸟类学家检定。洛克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资助下，还收集到另外一些树和蕨类的标本。

谷路科村民回忆说，洛克曾训练一个纳西族厨师作西餐。他是这个村里唯一的用刀叉吃饭的村民，而且通常是一个人就餐。

作为一个单身汉，洛克有很多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但据退休的夏威夷植物园主任保罗·威斯奇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时说，“他（洛克）从来没有谈及他有什么密友，我猜他也就有那么几个朋友而已。”

保罗·威斯奇是在洛克生命的最后几年才认识他的，而且是洛克有限的一点财产的遗嘱执行人。“我认为他太专注他的学术工作了，以致于无暇去发展友情。”

洛克有时也让一个传教士或其他西方人加入他的探险队。他就曾带上过埃德加·斯诺，就是那个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 30 年代至 40 年代崛起的美国记者。



洛克在他舒适的工作室内，工作室位于那鲁科村（现名玉湖村），床的上方晾挂着一排排摄影干版底片

然而，由于刚直和苛求的性格，洛克不可避免地要发现他同伴们的缺点和错误，从而导致和他们分手。他认为斯诺太天真，并且抱怨某个传教士有太多的“亲密情谊和甜言蜜语。”

实际上，这个无畏的探险家渴望的日常伙伴关系是可怜而简单的。背着罗盘不停地旅行，不间断地对野生动植物进行观察，这就是他所向往的。而由于工作的单调，他患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今天我感到非常地孤独。”当他在一所寺庙安顿下来后写到。1937年的除夕之夜，他写到：“我现在感到难以言状地孤独。”这当然是洛克的“浪漫旅行”中消极的一面。

但洛克总是能够恢复常态。“我呆着的这块地方，”在经过一次大的沮丧之后，他平静地写信给一位编辑，“人们不知道什么叫沮丧。这里没人为生存而奔忙，……像在工业化国家里那样……因此，这个地方不存在艰难岁月。”

“全谷路科村的人都来为我们送行，”1928年他开始前往永宁时记录到。他的骡子驮着他个人的家当：罐头食品，牲畜饲料，照相器材，以及为保存植物标本、种子而准备的纸和木炭。

象往常一样，与他同行的还有一队纳西人，这包括有他的厨师，赶骡人和几个经他训练过的、懂得采集和包裹植物标本的助手。

有时，他会抱怨他的助手们懒惰、不细心，就象他一次次地抱怨在中国遇到的各色人等：佛教徒们根本就不洗澡，穆斯林士兵简直是群强盗，以及那些傲慢的中国官员。但总的来说，他喜欢纳西人。有一次他甚至带了两个助手随他回美国。



洛克与他的纳西族卫士们在探险途中

他的马帮每天行进 10—20 英里。洛克总是在住下后拜访当地的头人和官员。为避免土匪的袭击，他需要这些有权势的人提供武装护兵。作为交换，洛克送给了一位官员一只价值很高的 45 口径的手枪。洛克自己带了两只这样的手枪。

有时他的护卫队多达 200 人。不过，尽管他的马帮有保护，还是遭到了至少两次攻击。“我们在对方的枪击下尽量还击。”他在描述一次遭遇战时写到，他的士兵在还击。“幸亏土匪的枪法很差，我们仅损失一个士兵。”

那天夜里，他住进一个佛教寺院。午夜时分，士兵们跑来警告说，土匪就在附近。“并且说，他们不可能保护我了。”洛克这时掏出手枪，准备逃跑或抵抗。“我打开箱子，向我周围的人分发了一些银元，然后穿上保暖的短裤，带上毛巾，浓缩牛奶和一些巧克力……这时，我每一分钟都盼着射击开始，”但是，土匪最终也没有进攻。

在 1924 年严酷冬天的一次旅行中，洛克翻越了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进入四川省，到达了“一个世界上罕为人知的地方”，这就是“木里”，一个面积与新汉普敦相似，而人口仅 2200 人的古老佛教王国。

在四周是院墙的寺庙里，洛克“穿上自己最好的服装，感情冲动地上前会见木里国王”。卓达强巴是个身材高大的君主，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还有点肥胖。他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摆上了酥油茶，还有一些用古老方法制作的、带斑点的奶酪。奶酪里混杂着牛毛，糕点也“硬得象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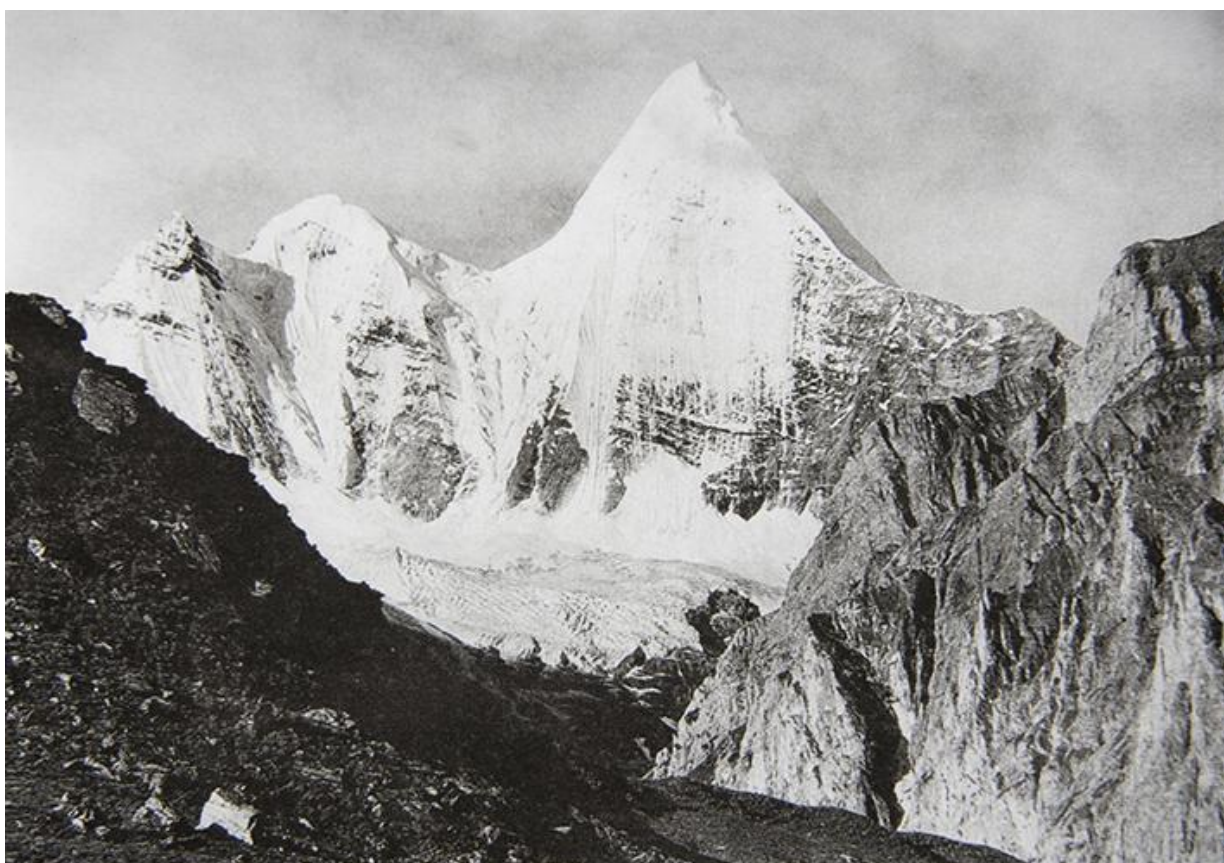
洛克谨慎地饮着茶，同时留心着周围的陈设。他注意到端上瓷茶杯的盘子是金制的。君主和他仆人的脖子都是又黑又油腻，“这似乎告诉我们，肥皂在这儿是没用的”。

木里之所以成为洛克最引人入胜的一篇文章中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卓达强巴。他单纯地象个孩子，好奇而急切地追问洛克一些问题。能不能骑马去华盛顿？那儿离德国远吗？洛克的望远镜能穿过大山，看到山那边的东西吗？



对洛克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那些比木里地区更高的大山，特别是位于中国与西藏接壤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脉。

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试图到达青海省的安叶玛昆山，但是，由于敌对的游牧部落和当地佛教徒和穆斯林的战争而停滞了计划。猛烈的暴风雪在持续，他最终还是到达了安叶玛昆山的深处。在这里，“即使是平坦的山谷，海拔也高于 15000 英尺。”他拍摄了大量关于这些山峰的摄影资料，并相信其最高峰达到海拔 28000 英尺。根据现代化的观测，他过高地估计了多达一英里，实际海拔为 20610 英尺。



贡嘎山主峰 洛克摄于 1930s

他不仅在测量上出错。在 1930 年早些时候，“国家地理杂志”收到一封令人惊讶的海底电缆电报，声称“贡嘎山为世界最高峰，海拔 30250 英尺，洛克”。

真的吗？难道洛克在四川西部发现了一座未在地图上标明的山峰，其高度超过了 29028 英尺的珠穆朗玛峰？如果是真的，那可是一条令人激动的新闻。然而，“国家地理杂志”推迟了这条消息的发布。

洛克毅然地带着无液气压计和其它测量高度的装备向贡嘎山挺进。但当他在距这座“白色金字塔”八英里远的地方估测它的海拔时，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贡嘎山的荣誉”于 1930 年发表时，洛克的编辑们慎重地根据其它资料的估计，将洛克测量出的贡嘎山海拔高度降低到 25600 英尺。（今天我们计算出贡嘎山的海拔为 24790 英尺）不过，洛克确实是第一个带回贡嘎山彩色照片的人。

洛克对中国西部地形和泰国、缅甸地形有着丰富的知识，因为这里是他 1920 年至 1921 年采集大风子树种的重点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空军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让他描绘出这一地区的海拔高度图，以利盟军飞行员们飞越“驼峰”，利用这一“航空运输生命线”在中国打击日本人。运输机群在印度起飞，飞越中缅边界的山峰，最后降落在昆明。

洛克为躲避战乱曾逃到印度，后又转道飞往华盛顿。他用船运回他的财产。这一行货物中，大量是他的纳西学研究资料，其中包括他潜心工作十几年的“纳西语—英语字典”手稿。由于货船被鱼雷击中，他的这些财产全部沉入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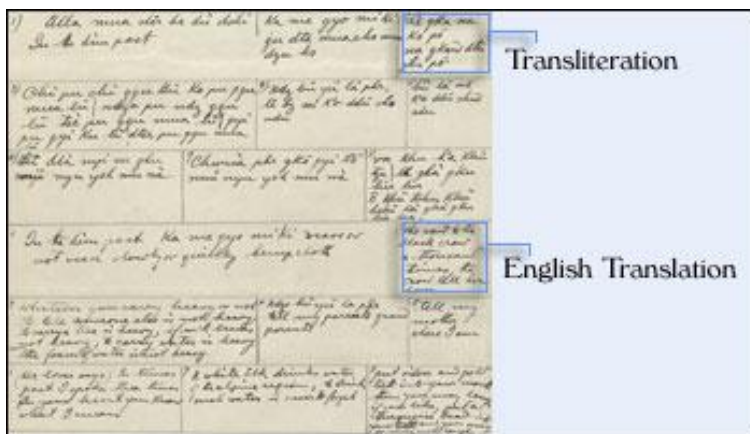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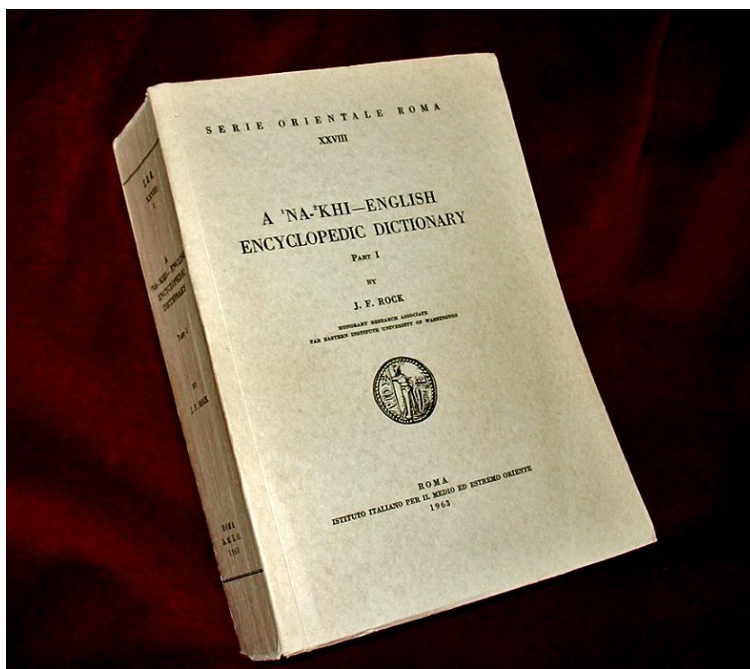
1929 年，孤独的约瑟夫·洛克居住在他最喜爱的泸沽湖中与世隔绝的小岛，以躲避当时中国国内战乱。

洛克中风了。虽然如此，他似乎一直在考虑返回云南，重新开始他的工作。在哈佛大学的赞助下，1946 年他回去了，并雇了几个东巴祭师帮助他重新翻译纳西象形文字经卷。

他不得不加快进度。“政治形势十分糟糕”，洛克在 1949 年初给他“国家地理杂志”的朋友吉普·罗斯写信时讲道。“这个省的南部和东部已在匪帮的控制之下”，这当然是指共产党。

大研镇（丽江），一个靠近谷路科村的小城，是 1949 年七月陷落的。“端着枪和刺刀的红军搜查了我的东西。”一个月后，洛克打点行装，离开了。

他在夏威夷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采集植物，继续研究东巴文字。他的两卷《纳西族历史研究》被哈佛出版社出版。在他写给吉普·罗斯的信中说，他希望能在 1963 年 1 月 13 日他 79 岁生日时见到他的《英语—纳西语字典》出版。但 12 月 5 日，他因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去世时，他周围摆满了纳西象形文经卷。第一卷《英语—纳西语字典》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出版了。第二卷出版于 1972 年。



洛克最著名的著作《英语 - 纳西语字典》第一卷及其工作文稿

我们的人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人；作为一个植物学家，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人和哈佛大学的人。哈佛大学还称他为历史学家和词典编撰家。但是，他更多地还是属于中国。他看到了那里，从它那里死里逃生，并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它。他真正地理解了它。

1998 年译于 北京车公庄
发表于《对外大传播》杂志 1998 年第 7-8 期





雅克 巴库，从西藏的寺庙到索邦大学的课堂

Jacques Bacot, des monastères du Tibet aux salles de la Sorbon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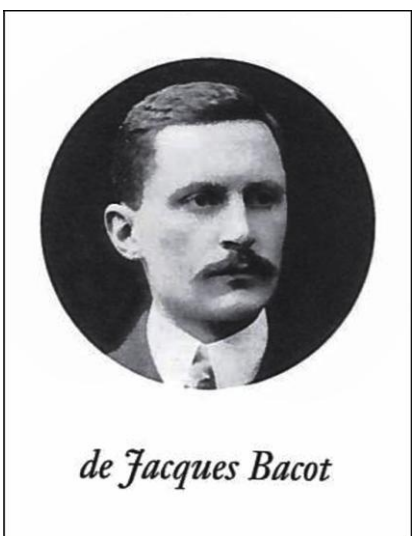
By Nathalie Bazin

作者：娜塔莉 巴赞

译文：范豪毅

题记：1996 年 10 月，在法国第戎美术馆举办了题为《亚洲的时代与面孔》的亚洲艺术专题展。期间集美博物馆因其装修工程闭馆向本次展览提供了 150 件馆藏供公众参观。在这次展览制作的目录中回顾了十几位在二十世纪初活跃在亚洲的探险家以及他带来的藏品。雅克 巴库是其中之一。

雅克 巴库，1877 年 7 月 4 日生于圣日耳曼昂莱（Saint Germain en Laye, 法国）一个在从安德尔（Indre）迁居到色当（Sedan）地区以呢绒制造为业的家庭。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对他父亲在鲁瓦莱



（Loiret）地区经营的瓷器生产厂毫无兴趣。然而，他的父亲却对儿子未来生活的选择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培养了他对旅行的嗜好。事实上雷蒙 巴库本人就曾在欧洲和非洲旅行，此后还将足迹留在美国。而且，他还是地理俱乐部的成员，在他的客厅接待过诸如萨沃尔尼昂 德 不拉查（Savorgnan de Brazza, 1852 – 1905, 意大利裔法国籍著名探险家，作为海军军官曾为法国打通前往中部非洲的海上通道，现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就是他的名字命名的）以及马塞尔 迪乌拉夫（Marcel Dieulafoy, 1844-1920, 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和珍娜 迪乌拉夫等著名的探险家。巴库的爷爷则早在 1830 年就曾游历过俄罗斯，作为当时代的伟大旅行家，老巴库曾经留下内容详尽的游记，而巴库也知之甚详。家族的遗传加上丰厚的财力促使巴库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踏上旅途，时值二十世纪初年。

探险者（1904 - 1910）

环球旅行

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爷爷都不曾到达过亚洲，而根据藏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 R.斯汀的回忆，巴库最初的计划是到太平洋地区探险。这个计划未能达成，而到了 1904 年，在他 27 岁的时候，巴库决定做一次环球旅行。正是在印度支那的旅行让巴库发现了亚洲，彼时正值连接印度支那和云南的火车投入运行的时候。他在那里结识了外国教士团的一些神父，也正是他们所给予的建议和盛情接待成了他所得到的极其珍贵的帮助。这些教士团成员当中的一部分从十九世纪中叶就驻足于云南、西藏和缅甸的交界处。

巴库曾经陪同他父亲聆听了地理学会有关亚洲北部探险的讲座。那些著名的人物如奥尔良王子亨利（Prince Henri d'Orléans）、瑞典人斯文 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瑞典著名探险考古学家）的旅



行和德国格伦魏代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 - 1935 德国著名印度学、藏学、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和冯 勒库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或英国人奥莱尔 斯汀（Aurel Stein, 1862 - 1943, 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所做的考古探险使中亚地区名声鹊起。然而，在地图上，西藏仍然是一个空白。

在那个时代，神秘的“西藏，智慧的国度”已被风传，西藏对外界的印象成了一个“有待攻破的城堡”。各种与西藏有关的政治事件和艺术的探索；德国传教士不顾禁令在西藏西部的旅行与法国传教士在西藏东部的旅行；照相术的发展促成了 1901 年第一次面世的布达拉宫的图片，这一切在西方都引起了关注。对藏传佛教圣殿神像的研究越来越多。到 1903 年，第一批藏画入藏集美博物馆。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巴库将进行从 1907 年 3 月到 12 月在西藏的第一次旅行。关于这次旅行的内容巴库在他的《西藏之行》中做了描述。

第一次西藏之旅（1907 年 3 月至 12 月）

事实上，巴库到达西藏的旅途一路艰辛，他是从云南入境一路穿行藏东地区，路上要渡过怒江、湄公河和长江。

“我要介绍的这一小片藏区并不是那些千里冰封需要好几个月才能穿越的毫无生趣的荒原。正相反，我是朝着有人的地方进发，去寻找那些不被人认识的藏民，且走且停的魅力远胜于一路狂奔。这些汉藏交界区是汉人试图征服的地区，也可能是西藏人口最稠密，最可爱和最肥沃的地区……这是有房子的藏区……也可以说是鲜花盛开的藏区。”巴库在他的书中开首部分是这样描述其所见的，尽管他在这里逗留少不了受到传教士们的告诫。确实，当时正是 1905 和 06 年藏民反抗汉人的争斗刚刚平息，其间，“被砍掉的脑袋像成熟的果子落地一样多。”他所收集的证言来自两位逃脱屠杀的传教士和当地的官员以及途中护送他的官兵。

他的团队包括十五头骡子和其他二十多人。此外，陪同他的还有一位厨师、两个仆役和两个翻译，一个是汉语翻译，另一个是藏语翻译。汉语翻译是约瑟夫，他是跟从奥尔良王子亨利开始翻译生涯的。尽管由于汉藏冲突导致路途多险，巴库只是以一般“游客”而非探险家的面目出现，因为他的旅行路线最终通往藏区的撒容，这是一个已为人所知的路线。但是，在路上他还是要不断应付旅途上的险情：走过用绳索搭建在湍急咆哮河流上的吊桥；穿过“吹一口气就可能崩塌的夹带着碎石的冰川”。不仅如此，他还要骗过汉区官府的盘查以及扈从的警告，他是第一个穿过梅里雪山的欧洲人，梅里雪山“就像喜马拉雅山祭坛前摆放的一个苍白耀眼蜡烛架。”此地是西藏东部，怒江和湄公河两江之间著名的康巴人的朝圣地，而且这个地方也是西方人所知道的。

他还试图进行另一次征服，目标是地处康巴地区的贝域（Poyul），一个小王国。但是，地方官方强制他取消了行程，尽管他距离目的地只有二十来天的行程，理由是“在那里，人头像暴雨后最后的雨滴纷纷落地。”



经过初次旅行，巴库自认是为旅行而生的，他在书中写道：“没有旅行过的人永远无法知道流浪的生命是一种多大的享受，享受身处一群异邦人中间的孤独，和他们蹒跚而行，开始和他们在一起只



要能活着就行，然而到最后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爱上他们……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童真而又罕有的乐趣，这是旅行家，无论其强弱才能体验得到的：成为第一个享受这种壮美景色的的人，就好像它从天地创始之日起就在等待着我的到来”。看得出来，巴库对探险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这座横亘在禁行区前的大山，如此顽劣和巨大反而激起我无论如何要攀登的欲望。”从他的描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巴库还是一个伟大的动植物观察者，他对动植物的描写敏锐形象。他在对黑鸢尾的白花进行描写时写道：“（白色的）花朵高高地开在花茎上，好像一串眼睛看着你走过”，金龟子“像随意制作的首饰错杂在面无表情藏民巨大的发辫中”，还有那些牦牛“神情调皮，腿部以上和整个肚皮都覆盖着长长而且厚重的毛，就像芭蕾舞女的裙子”。巴库的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其实还伴有幽默感，有时甚至是辛辣的幽默，这一点在他身上一生都没有改变。

很快，巴库就被藏民吸引住了，并且在面对汉人的蔑视时自愿为他们辩护：“这些用手抓饭吃，甚至没有床的藏民实在是有趣的哲学家，他们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加专注于追求书籍的奢华。他们将智慧用于生活，并且用金字印刷在内容无限丰富的作品中”。他“抱着极大地热情关注他们的生活，揣摩每个人的性格，而后是这个种族的性格，而且，透过灵魂的外衣，从根本上发现与所有人同样具有的善与恶”。而“当我的眼睛习惯于看到藏民们褐色的肌肤和他们缓慢而沉重的动作以及他们宽大的衣袍时一眼瞥见某位粉嘟嘟的先生穿着土黄色紧紧巴巴的衣服，动作风风火火，匆忙而动辄发怒的时候，我就会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和这位粉嘟嘟先生并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心里就会升起一把无名火”。



在关于这次旅行的第一次讲述结尾的部分，库巴已经身处缅甸准备返回欧洲，但他仍然无法忍住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看到墙上张贴着各种警察的规定和告示。这缕文明的芬芳让我心中不禁一冷：这正是对高度自由的流浪生活的侵犯。”与他同时回到法国的还有安吉路普·冈布，一位巴通的西藏人，他在一段有趣记述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逗留感受。

1908年，巴库加入了亚洲理事会并在高等实用研究学校办理了学生注册，他选择了历史和哲学专业并师从希尔凡·勒威（Sylvain Lévi, 1863-1935，法国著名东方学和印度学学者），后者主持印度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加入了藏语教学。于是巴库着手翻译一部藏语对谈录《**维善塔拉本生经**》，即佛祖的本生故事。但他这次在巴黎的逗留时间并不长，而且由于他跟安吉路普学习了藏语口语，待到1909年，他再次向“反抗中的西藏”出发，进行一次新的旅行。



在西藏的第二次逗留（1909年5月28日 – 1910年3月14日）

“这个奇怪的国度究竟有什么令人生畏的魅力，总是让只要来过一次的人再度返回？”这是巴库在他的第二部西藏游记的前言里发出的感叹，这部游记比起第一部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他非凡的写作才能。“到过西藏之后，会感到中国的平庸无趣，它的组织结构和我们的过分相似。因此，不如掉头回到西藏，正是对它的无知才有吸引力，对这块土地而言，地球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

当时居住在湄公河沿岸撒口的传教士蒙贝格神父曾经告诉他西藏当时的政治局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而蒙贝格神父也在1914被人谋杀。然而，这也无法阻止巴库，他无视危险，执意进行第二次西藏之旅，而地点在“汉藏战争最为血腥的地区”，当时，他除了蒙贝格神父提供的消息对其他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摄于中国的威胁离开拉萨前往印度避难。

记录了他沿着一条大部分杳无人迹的路线穿越整个康巴地区的旅行札记构成了二十世纪初当地状况的重要见证。此后他通过尼亚荣（Nyarong）地区到达理塘县（Lithang）。然而他“理想中的目的地”仍然是贝域（Poyul）这个“位于拉萨和中国边境地区不为人知的小王国；关于它人们只知道一些传奇故事”，据说那里有狮子、原牛（aurochs）和麒麟（Licorne）。根据巴库本人的说法，那里的住民以劫掠为生而且任何人都不敢进入这个地区，况且那里的巫师也是非常可怕的魔法师。当然，巴库对到达那里也没有任何指望，最终也只能选择放弃，“在探险的路上只能随遇而安，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能去哪里才去哪里，全凭局势左右。”

然而，局势将裹挟着他和一群逃亡的藏人向白马科（Nép émakko），藏人的福地进发，关于这个地方他也是道听途说，但最终也没能到达。他甚至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只是听说在贝域（Poyul，是否是传说中的“贝域”（神仙秘境）有待查考，建议参阅廖东凡先生在微博上发表的《西藏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乐土》一文：<http://www.ebaifo.com/fojiao-14557.html> ——译者注）和拉萨之间的某个地方，据说那个地方“和印度一样炎热，鲜花常开，土地肥沃，人们无需耕作，只需摘取大地的果实。”根据传统的说法，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曾经到访这个小城邦，他曾预言：一千年后佛教将遭遇灭顶之灾，喇嘛僧众将栖身于此地以葆薪传，以待久后再度弘扬佛法。不过，巴库曾报告说在荣赫鹏（Younghuasband，1904年率英军入侵拉萨的将领——译者注）率军进入拉萨前不久，一位大喇嘛曾经在寺僧的陪同下寻找白马科，并且在经历五年的探寻后终于到达了那里，并发现“那是个他从未见过的城邦。”巴库屡次骗过中国官兵的监视尝试前往。“只身一人与这些神秘的牧民相处数月之久，他们的寓言故事和童稚的心灵令我欢心不已。对这块遥远的失望之地的眷恋令我感到揪心。绝望之中，我仍然期待见到这片乐土，我可能不再有机会再来，我们可能终将全部死去，就像被这个想法吓坏了的我的藏民兄弟，这些史诗般的伴侣还处在自身历史中虚幻的时代，生活在自身的传奇中。”这位被“我的”藏民兄弟特意起了一个叫做“塔兰”的绰号，意即“高大和宝贵”的巴库的语气已经变了；他“被那个福地乐土的海市蜃楼蛊惑了”。对于巴库来说，这个朝圣之旅不仅给了他和藏民形影相吊的机会，也给了他与之肝胆相照灵魂相通的机会。他的旅行升华到一个新的维度，成了名副其实的心灵之旅，而不仅仅是对地图上标注的未知地区的探险。

西藏及藏民对他的征服是如此之彻底，仿佛对他施了真正的魔法，以至于他在此后及至余生都致力于更好地了解西藏和藏民。他对藏民们的情感浓厚到在他对第二次行旅的记述中从头至尾都不断加以表述。甫一到达，他立即被西藏“再次唤醒”，西藏“是这个地球上最激动人心的国度”，同时被唤醒的还有他流浪的本性。“我感觉从来就生活在这里，而且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我企望未知的世界广阔无垠，在无数年内的每一天我的龙马帐篷都扎在一个新的地方。如此旅行给了我双倍的生命，停留和定居无异于虚度残生。”他羡慕那些在路途中偶然遇到的游吟诗人，“羡慕到想哭”，他们可以在西藏自由行走，信步由缰。这种想法开始融入他的思想：“一个人生活在藏民中间，种族差异的概念瞬间消失了，其速度之快令我吃惊。”他的理想境界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新来乍到的原住民，只需和同类一道生活而无需做任何评判。



像西藏人一样，巴库活得“有点像在梦中”并且把自己抛在“时空的底层……获得的快感是如此摄人心魄，非笔墨所能形容，以至于为此付出生命也无悔无怨。”当然，作为法国人的巴库不仅对西藏人的乐观和自尊赞誉有加，同时也对他们的好客和诚实给予赞扬，这些性格鲜明的人“在坚韧耐劳的同时又具备诗人的性格，既有行动能力又有沉静的思考能力”，在他们“粗糙的外壳下”隐藏着高度精致的文化；“与他们的国家一样，西藏人既不野蛮，也不缺少教养”。巴库就是这样总结出因果关系。在西方对这些人还抱有居高临下甚至蔑视态度的时代，巴库对西藏文化的认可和赞赏是非常令人

感到意外的。但是，巴库走的更远，在的游记中，他多次清晰而且不带任何幻想地表达了他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野蛮总是被隐藏的，而其所谓高级的文明仍然保留着“对财产野蛮的贪欲”或者说其嗜杀的秉性是西藏人所没有的。他对那些传教士美化本土的倾向以及那些探险者好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肆无忌惮表示愤怒。如果西藏住着“一些奇特的人，他们有着有别于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其他人不同……而西藏之所以奇特在于它有时居然也会有和其他的国家相似的地方”；巴库似乎是为了安慰读者，打消他们的疑惑，为了证明西藏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平等的，他向读者提供了诸多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诸如同样具备与生俱来的斯文尚礼，同样地敬惜书籍……甚至他有时会激情勃发地在两者之间作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比较，比如，他会发现他停留过的某个



商家好客多礼让他联想到十五世纪卢瓦尔河畔的旅店。同样，在将藏民和汉人之间作比较时，他认为后者毫无魅力可言；他对汉人所作的评判毫不留情，不留余地，而且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有些幽默之语简直是毁灭性的：“在中国人的生命中通常只有两件事：吃饭和敛钱。他们一生出来就为了干活，像昆虫一样忙碌到死。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曾经生活过吗？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让他们伤脑筋……而于他们而言，无知使他们获得似有似无令人发噱的幸福感，因为他们觉得比世间所有的人都高明，并且占据着世界的中心”。巴库认为，中国人只是在人数上统治着藏民，但是“于人种而言，是不是也应该像自然界一样看待呢？稀者为贵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评判质量的标准呢？”

巴库用人类学家的眼光观察西藏和西藏人，同时，他对自然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并用感性和诗一样的语言进行描绘，他也对藏区生活中的所有民间活动和文学感兴趣，他请抄经师抄写经文，也关注



戏剧、音乐和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方面，他甚至乐于将西藏僧侣的唱经与格鲁吉亚的民歌进行比较。在他看来，“唯有民俗、教育，特别是宗教才赋予单一的和相同的灵魂以多面性，在所有的地方灵魂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巴库既没有到达贝域，也没能到达白马科福地，他的第二次西藏之旅至少让他实现了一个偶然但是重要的发现：伊洛瓦底江的东部源头，这可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地理学家之间进行的许多探讨甚至争论的话题。

尽管西藏人鼓励他向西藏腹地——反抗中的西藏进发，但中国政府意欲消灭西藏人的威胁加上面临盗匪劫掠他所收集的文献资料的危险迫使疲惫不堪且心有不甘的他不得不选择打道回府。他因为“眼见要离开这一切的时间迫近而要孤独地回到文明世界的人群中而忧心忡忡”。他向安吉路普致意，感谢他许多年来与他共同经历旅途风险，并且帮助他“忘掉那种阴暗、斤斤计较、忧虑重重的忙碌生活，尽管这样说有点夸张，但我又要回到这种生活”。巴库这次离开西藏就再也没能回来，清王朝的覆灭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西藏全境都在英国人的控制下完全封闭。后来，在 1913 至 1914 和 1930 至 1931 年的冬季，他曾在喜马拉雅山一线，特别是在噶伦堡（Kalimpong）和锡金做过学术性逗留。在那里他遇到了皮埃尔·德格拉斯（Pierre de Grace，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后者也是一位痴迷于西藏的人，两个人结下了友谊。不过，第二次西藏之旅也结束了巴库作为探险者的生涯。一位曾经在 1909 年在中国西部藏区游历，并于 1914 年到过打箭炉（打箭炉是个古地名，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康定市。康定，藏语名叫“打折渚”，打箭炉系“打折渚”的汉译雅化，该名录最早出现与《明史·西域传》中。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清政府将打箭炉厅改为康定府，康定之名才始见于史。1913 年，国民政府为县，康定才始有县志。——译者摘自百度百科同名条目）的法国人维克多·塞佳朗（Victor Segalen，1878 - 1919，法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作家、诗人、探险家、艺术理论家、语言及文学家）于 1917 年在河内写下伟大诗篇《西藏》的第一稿。在这部“高原颂歌”中，他这样提到这位旅行家：

“凝望者，望着最高的峰顶沉思。

何者西藏之主？长住之人，真正的 Bod-Pa（藏语：西藏人）。

微笑着，行走着，一言不发……

庄严地走向山谷福地，

一心要步入最后的未知国度……

未竟之旅也值得欢呼，

期待更造就神秘，

望眼欲穿之地……焉知不会再来。

下笔神奇，如同经卷金书，

知行合一惟其最著：

《暴动西藏》，高原星火，

山高路远，征服者为其所俘，

欲知西藏必读《西藏之路》（巴库的西藏游记——译者注）。”

很久以后巴库把他发表的一部著作《西藏历史导论》（1962）的其中一章献给在共产党中国之前到过西藏的欧洲旅行家，在结束是书时他提到了著名意大利藏学家图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译者注）：“他成功地成为西藏探险的关门人，在这个延续了四个世纪的事业中，所有的探险家都服从着一个共同的而且特殊的信念，渴望揭示未知的世界，渴望征服艰难险阻，渴望了解西藏人民的性格”。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总结巴库向往西藏的原因，同时，通过他一贯清晰的表述方式承认在探险家的“这个追逐发现的热潮”中必不可少的含有另外的成分，就是或多或少自我逃避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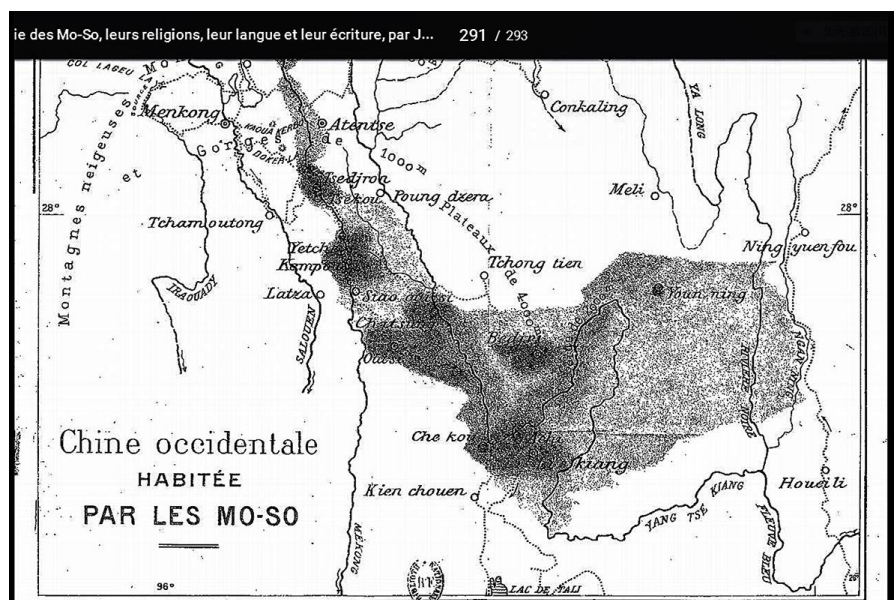


藏学家（1912-1962）

这两次西藏之行让巴库发现了自己想要成为藏学家的志向，与此同时他还向多个方向发展：人类学、语文和文法学、翻译、文学、历史和宗教。

回到法国后的 1912 年，他的一篇研究**藏东地区民生**的论文发表在《人种和社会学刊》上，后来在 1924-1925 年间，他还成为该杂志的编辑。1913 年，他发表了《摩梭人，他们的语言和他的文字》（中文译名至今仍沿用旧译《麽些研究》——译者注），这是他第二次在中国逗留期间收集的有关这个不为人所了解的族群的资料的汇编。同年，他娶了一位勃艮第的女子玛格丽特·泰纳为妻，后者是化学家路易-雅克·泰纳的孙女。就此，这桩婚姻让他成了勃艮第的住民。在二十年代，他在这个地区买了一栋私宅，每年夏天他都会在此居住直至 1964 年，这所房子还配有一个“西藏粮仓”，他在这里存放一部分他的收藏品。

他在藏语研究领域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知藏语的丰富性，必须区别宗教用语、书面用语、贵族或平民用语，其词汇和语句结构的使用要根据对话者的身份发生变化，因而，他不仅乐于听也乐于说藏语。他还特别注意到藏语“**十分讲究等级和礼貌用语，其丰富程度超过或者远远超过汉语**”。1912 年，他写了一部藏语草书字汇。他还重拾学业，1914 年他在完成了第一次旅藏后开始着手翻译的以戏剧形式广为人知的藏文本对话体**维善塔拉本生经**后获得高等实用学校的毕业文凭。巴库选择这个版本来翻译恰恰揭示了他对西藏民间民俗的喜好，他的这个喜好正是他别具慧眼之处。实际上，他是最早对西藏民俗感兴趣的藏学家之一。此话说来容易，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专家对西藏和藏语的兴趣是因为更看重西藏是最早翻译梵文佛教经典的地方而所用的语言是藏语。他第一次旅藏回国后选择学习藏语口语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获得毕业文凭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诸多研究工作中断，而巴库在 1914 年 8 月应征入伍，他先是在一个步兵团里担任军官，直到 1917 年 9 月被调到法国驻西伯利亚军团参谋部，而这个军团的指挥正是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著名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为法国掠回大量的敦煌经文和文物。——译者注）！毫无疑问，两个人的相遇对后来巴库倾心于敦煌藏文经书的研究是有决定意义的。

巴库的职业生涯是从战后才真正开始的。事实上，他从 1919 年开始应希尔凡·勒威（Sylvain Lévi）的邀请在高等实用学校教授藏文，这个志愿教习一直做到 1936 年希尔凡·勒威去世那一天。此后，



他担任藏学研究专业的主任之职，而这个专业的创办也是他的主意。他一以贯之地坚持研究纯藏文著作，这也是他语言教学的基础。巴库坚信西藏文化的原创性在于其多样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在文学领域，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很新颖的。“说西藏人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异于说我们的古典文学不是法国的，而是从古人那里拿来的。至于说到西藏文学，虽然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它是可能存在的，或是说很有可能存在的”。此外，两次西藏之旅他带回了一批藏文书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把这些书赠予亚洲理事会。他运用语法解读藏王出使大臣端美三菩提（Thonmi Sambhōra）的祷告诗（Slokas），后者在公元七世纪根据藏王松赞干布的要求仿照印度文编写了一个藏文字母表，而在 1928 年，巴库在集美博物馆的年鉴上翻译并发表了端美三菩提撰写的藏文语法。他为这部著作所做的评论也得到路易·勒努（Louis Renou, 1896 – 1966，法国著名作家和印度学家——译者注）的激赏，称其为“博学精研的典范”。紧接着他又在 1930 年出版了照相版的藏语-梵文字典。此后，在 1948 年他还发表藏语文言字典，这次是他独立完成的。按照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法国当代作家，专门从事与西藏有关的文学创作——译者注）的说法，他的这部著作“至今无有其匹”，她还强调说：“这是第一次藏语语法是用西藏人自己的分析方式呈现的，而不是勉强套用拉丁语或盎格鲁-萨克逊语言的分析标准和语法结构”。

我们已经知道，巴库酷爱藏剧，称其为“高海拔的戏剧”，而藏剧的舞台就是寺庙，那些分布在“亚洲之巅的山谷里，……那片令人情不自禁匍匐祈祷，被施了魔法的沙漠绿洲”上的寺庙。巴库曾经有机会看过一部或两部《佛门秘史》，剧目的内容是从《本生故事》或西藏历史和西藏的圣徒故事里提炼出来的。西藏男子的声音使巴库迷醉，在西藏，“人们不会像亚洲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喊叫”，正相反，他们的“声音沉厚而温柔，这种声音只有在俄国人那里才听得到”。他还谈到在这个被人视作野蛮的国度里藏剧诺桑王子（Namsal）却显示出西藏文化的魅力和典雅。1921 年，他将此剧放在在一部专门讲述西藏三大神话的合集中翻译发表并做了注释。在 1958 年发表的译作藏剧《苏吉尼玛》的序言中，他特别讲到了翻译工作的难度，在藏语的翻译中要满足自己寻求的信、达标准显得尤其困难。巴库为这些西藏神话所作的翻译对于公众认知藏剧作出了巨大贡献。

藏学家们对藏传佛教神秘的代表性人物也同样感兴趣，因而使巴库有机会在（1925 年）翻译诗人密勒日巴（Milarepa，公元 11 世纪西藏最伟大的禅修大师，诗人，也被称作圣人——译者注）的生平传记时展现他在翻译领域里的惊人才华。马可·巴利斯（Marco Pallis, 1895-1989，希腊裔英国著名藏传佛教学者——译者注）在《密勒日巴》1971 年再版前言中强调说：“翻译的艺术从来没有得到过本书所取得的成就，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文学意义上可以用‘灵光乍现’来作敷衍之词的。”巴库表现出自己对西藏神话具有超凡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源自他在唐古拉山的朝圣之旅，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写出如下的感受：“……东方苦修者之求索，无不以忍受骇人听闻之独立苦作为代价，惟以其意志之坚有甚于迷醉岂有他解，其内心煎熬足可感天”。但是，巴库的文学情怀并不妨碍他注意到密勒日巴行记中有关地理问题透露的信息。要知道，就地理问题而言，他从 1920 年起就是法国地理委员会的成员，此后更成为法兰西地理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为密勒日巴大师传记所做的翻译又在 1937 年被继之以玛尔巴（Marpa）传记的翻译，玛尔巴是密勒日巴的导师。巴库对藏传佛教神秘的一面颇感兴趣，这在他的出版物中多有表现，特别表现在他的《佛祖传》（1947 年）。乔治·柯代思（Georges Coedès, 1886-1969，法国著名碑铭研究专家和南亚问题专家——译者注）曾评价道：“这是一部形制短小而内容博大精深的作品……这可能是了解佛教最好的启蒙读物，作者以其清晰的文笔将公认的佛教理论晦涩难懂的观点做了透彻的解析”。

此外，巴库毕生致力于藏史研究。1940 年，他着手出版和翻译有关藏史的敦煌藏文书卷，这些书卷是伯希和的考古队带到巴黎和伦敦的，他的翻译工作由于战事被推迟，而在战争期间他在家里还掩护了一个反抗组织的支部，上述工作直到 1946 年才得以重新开始，并发表在集美博物馆的年鉴中。



这些著作的出版工作是和陶玛士（F.W. Thomas 英国藏学专家生平信息不详——译者注）和图赞 C. Toussaint（生平信息不详——译者注）合作完成的，后者向集美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的西藏文物。十年后，他在亚洲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另一部藏文书卷文献译本《八世纪回鹘五使节访问亚洲高原南部》。该项工作得益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藏文文书收藏。

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之一《西藏历史导论》（1962）是由他任主席的亚洲理事会出版的，而前任主席是伯希和。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用这样几句话说明了西藏在它的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位置：“若以物质论，西藏之历史乃是中国历史之一章。若审视文化，即精神之形成，西藏当属印度。两种影响交相层积，既无违和，亦无争斗，于是，印度之精神，中国之外表，虽各异其趣，却互为表里矣。”该书的最后一章专门用来写旅藏的欧洲人，如天主教遣使会教士胡克（Évariste Régis Huc, 1813 - 1860,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旅行家，以其旅藏笔记闻名，1845年年底与秦噶嘒共同进入拉萨，后被清政府驱逐出境——译者注）和秦噶嘒（Joseph Gabet, 1808 - 1856,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国北部和西北，后陪同胡克进藏——译者注），他将两个人的旅藏笔记视作“探险文学中最为生动”的作品。他还提到 A. 达威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 - 1969, 生年 101 岁，法国最著名的女藏学家、歌剧演唱家、记者、作家和探险家，以 1924 年化妆乞丐和穿着喇嘛长袍混入西藏拉萨闻名——译者注）和 G. 图奇（G. Tucci），他与这两人相熟，然而，他还是“忘记”提起他自己的旅行。

他所有这些著作只是他所参阅的卷帙浩繁的文献标本，见证了他辛苦劳作的一生，直至健康衰退也不曾稍歇。他身后还留下一部未出版的译作内容是书信和官方文书。

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

雅克·巴库在他完成第二次旅藏后在 1911 年集美博物馆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白了自己对西藏艺术的观点，而他的发言被用作同年举办的相关展览的序言。这个展览的目录编目是由哈金主持的。这次展览的主题本身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大胆的，因为“拿出象西藏那么一个野蛮国度的所谓艺术品来展示肯定要面对必然招致的疑问，”这是巴库本人的说法。确实，当时西藏人在西方的声誉并不好，西方人对西藏人的判断是严厉的，巴库指出：“……这或多或少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不愿意人别人了解自己”。即便从西藏带来的艺术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惊世骇俗，但也远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可。巴库此时挺身而出又一次担当西藏艺术的捍卫者。他对西藏艺术的阐释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例证，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一个藏学家、而且是有过藏地经历的藏学家会怎样看待西藏艺术，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西藏还处在被发现的开始阶段。特别是 1904 年，在巴库还在准备他的环球之旅之际，有两个重要事件使他把注意力放到了西藏：英军上校荣赫鹏领兵进入拉萨，企图强迫西藏人与英国人建立政治和商业的邦交关系而不是和俄国人，因为英俄是对手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支西方军队进入西藏首府。在这次征服行动中有东方学学者参加，因此获得数量可观的信息和实物；实物中的一部分成为第一批被运到西方的有质量的物品。在同一年，在图欧拍卖行（Hôtel Drouot）举办了那次著名的被叫做淦贝尔藏品（collection G）拍卖，拍品包括“西藏的艺术品和高档工艺品”，对公众来说也是一次发现。这次拍卖所使用的拍卖目录也是史上第一次用法文写成的有关藏传佛教人像的印刷品。集美博物馆通过这次拍卖也获得了几件实际上属于汉藏混合风格的艺术品。



在巴库看来，“西藏的宗教艺术全部源自印度，特别是源自尼泊尔”，而且，无论是涉及世俗的或是宗教的艺术，我们“在两种艺术门类中都找不到任何我们对所谓大艺术提出的要求……表现自然和生命，将一种想法、一个动作进行融合通过表现其本质和本真引起共鸣”。他指出，与其说缺少表现性是因为西藏“艺术家没有个性，或许不如说他们不被允许具有个性”。似乎永恒不变的人像（当指唐卡——译者注）特征是从佛教引入西藏后就是如此。然而，他又说道：“西藏人对宗教事物的尊重导致十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东西，这或许对他们的艺术发展不利，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做法提升了作品的文物价值，也算是一种补偿”。就象人像一样，西藏艺术作品的风格一成不变，甚至不管其来自何处，似乎都没有经历过变革，也让人无从确定它们的绘制日期；只有作品上累积的灰尘和藏香的熏烤痕迹可以让人估计画作的新旧程度。几年以后，在他的另一则笔记中，他又开始不同意西藏艺术一成不变的说法。在他看来，西藏艺术品的使命是短暂的，因为总是要发生地理位置的变化，所以“藏画的作法更多的是为了随时可以卷起来带走，而不是为挂在那里给人看”，完全像那些银器和书籍“总是包起来或用绳子扎住，就像等待着下一次出发。西藏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从不居住而是临时驻扎”。要强调西藏艺术被视为亘古不变的概念由来已久，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发现艺术的历史并对其进行研究与藏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比较起来还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开始。



如果说巴库早期对西藏艺术的评价是有贬损和严厉的，那么他后来所做的观察和他初期的判断就向天平的另一端倾斜了。确实，他特别强调作品的制作水平，（西藏）艺术家们“与生俱来的装饰和把握比例的禀赋”使他们可以信手画出群像而不失装饰细节和色彩的和谐。巴库的收藏很好地体现了他对藏画装饰性的敏锐感觉。他看重藏人门板雕刻的精湛技艺和模具工艺，所以尽管这些艺术品缺少性格，他还是认可艺术家们还是有一些创造能力的，因为“当你细致地观察藏画的时候，他们每次都要作一幅新画再加上精湛的画工，即使最好的艺术家也不能不给他们自己的作品打上个性的烙印”。巴库最为人们称道的能力之一就是具有预知能力，他坚持认为西藏艺术确有其原创性和丰富性就是一个例子，完全像他确认存在纯粹属于藏人的文学一样。巴库意识到，由于他只是游历了藏东地区，所以他对西藏艺术的认识只是部分的，需要将来不断完善。“这有点像只看到过法国两三个省的艺术就来判断法国的艺术一样”，他的这番话充满自谦和开放的精神。而在他的《反抗中的西藏》一书中，他为中国人那种“只要不是中国的东西就完全不懂美在哪里，”而且蔑视西藏艺术的态度表示惋惜，不过他倒是承认中国人是更好的艺术家，“这也证明了艺术包含一些无意识的东西，批评是有扼杀作用的，是创新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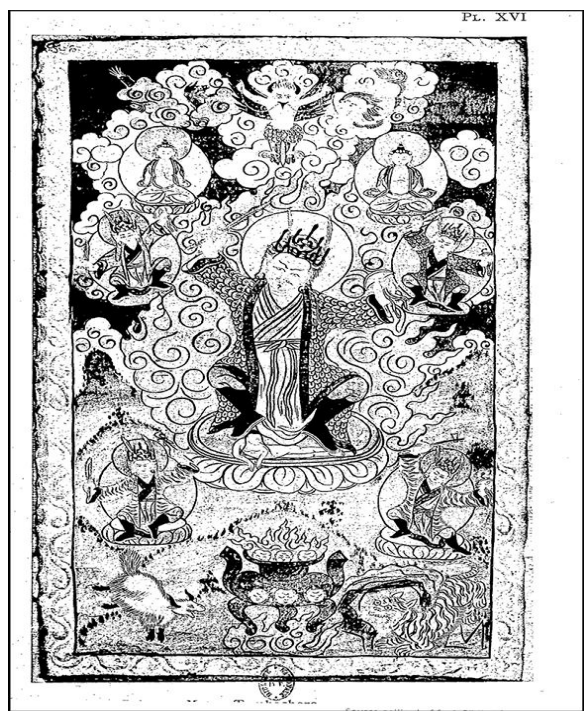
巴库在西藏艺术家身上看到神秘主义的东西，不带情色，这是在他做的一个比较中将西藏的艺术与中世纪前的艺术家做了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他惯于做这种比较，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印证他对西藏艺术家的评价，所以他也坚持这样做。“西藏艺术家凭的是感觉，但并不知道所以然。学来的艺术不会达到如此的效果和和谐，而这种效果和和谐似乎总是偶然天成的”。



巴库获得的收藏品都是听凭他旅藏期间碰到的机遇，在 1911 年的发布会上他曾指出：“谈到我个人拥有的文献，都是在到达藏区东部边境时偶然获得的”。在他的第一次旅藏期间，他从一个中国士兵那里买到一批位于打箭炉和巴塘之间的喇嘛庙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曾于 1908 年在集美博物馆的一个临时举办的展览上面世，同时展出的还有佩拉尔迪（Péralte，生卒年和生平事迹不详——译者注）的藏品。巴库的藏品是一共 163 件祭拜用的器物，木版印经书和三十多件小佛像，画像的数量较少，只有 16 件被展出。巴库本人还讲到，他当时还有兴趣把自己的佛教藏品和苯教藏品放在一起展出。这次展览的目录是由哈金编订，其中包括画像的展出顺序，但并未对画像的美学价值做评估甚至没有尝试做断代。在当时以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西藏艺术品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画像，并且价格的指标主要以年代、画面的复杂程度和藏传佛教祭祀场面的怪异程度，后者也是吸引注意力的因素之一，但是，从 19 世纪末以来，在西藏艺术领域里的研究取得了极大地发展。

1911 年集美博物馆为巴库做了专场展出，场面较第一次大了许多，因为加入了巴库第二次进藏带回来的藏品，当时中国军队的毁庙行动造成大批藏族艺术品涌入市场。巴库似乎在印度边境地区也获得一些藏品。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藏品的确切来源。人物画像达到上百件，非第一次展览可比，这样人们也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风格变化。还要加上小佛像和圣物盒，丰富了藏品数量。这次还是哈金来做展品编目，质量非常高。遗憾的是这本目录没有附图，因此无法与实物对照，展品的描述也很笼统。

1912 年，巴库决定把他藏品的大部分捐赠给集美博物馆，此次捐赠是集美博物馆建立西藏专题的最初收藏，也为后来这一部分的藏品发展打下了基础。埃米尔 集美（Emile Guimet）在 1912 年 3 月 28 日写给巴库的一封信中对巴库刚刚作出的特别捐赠表示感谢：“您慷慨赠予集美博物馆的西藏文物藏品是由您本人亲自从亚洲带回来的，这些藏品构成了本馆第一流的相关收藏品。其科学意义十分巨大，但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其艺术价值。有了这些非同凡响的藏品，我们的博物馆得到极大地提高和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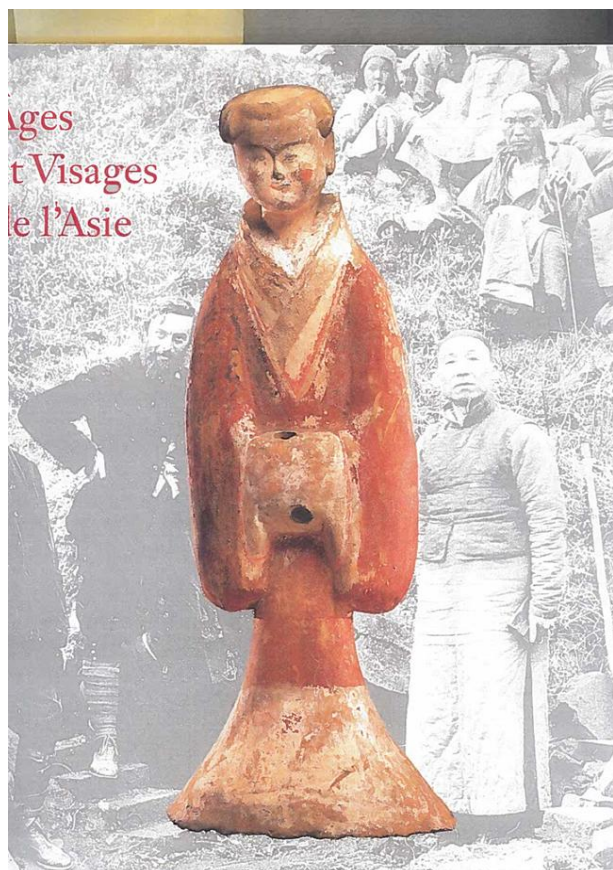


我本人对您刚刚做出的决定深感荣幸之至，并想到是哈金先生促成这些伟大的藏品在此展现的举动促使您将它们贡献给它们第一次面世的地方。”一些在 1911 年并未展出的藏品也被捐赠给集美博物馆。这部分藏品主要来自于藏东地区，且主要是 18 和 19 世纪富有装饰意味的艺术品，其中一些当属精品。他的人物像（唐卡）收藏特别丰富多样，其中包括佛祖释迦牟尼像、菩萨像、宗教人物像、慈祥相之神或怒目相之神。此外还有各种法器和祭祀用品如：佛骨舍利塔、转经筒、法器、乐器等……这些都让人想到巴库对藏传佛教仪式的明显兴趣。在一大批高质量的金属艺术品中有许多佛像，这些佛像的体量通常很小，但有些具有非常强的表现力，例如一尊来自藏东或中国的吉祥天母像；另有一尊印度教莲花生大师像，盘腿坐在两位妻子中间，据说一位是藏人，另一位是印度人，三人居于莲花之上，这是两件非常特别的宗教艺术珍品。在捐赠品中，

72 件绘画作品是重中之重。有些作品的尺幅相当大，最大的高度达到 2.73 米。到了 1970 年，这些藏品中的一部分被转放到里昂集美博物馆、图卢兹乔治拉比博物馆以及第戎美术馆。人像作品多数来自藏东，内容多样，其中有一个完整的图说系列作品，例如讲述释迦牟尼生平的两组画就有别于西藏其他的木版印刷系列，这种叙事系列画在西方的人物画像收藏中数量不多。除了叙事系列画以外，还有



一些最为常见的表现天界、曼陀罗和西藏著名宗教人物的画像。很多画作都具有中国绘画元素如风景的表现或色调的运用显然采用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不过，有一些画作的表现形式非常特别，与常见的汉藏混合的画风截然不同。大部分作品属于界画风格，这是一种流行于 18 和 19 世纪康巴地区的画风，也是收藏界收藏量很大的画种。这种风格的特点是画面色调通常较暗，使用源自中国的散点透视法，使用青绿色打底，整个画面使用纹饰背景并有描金。一幅 19 世纪的绿度母像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而另一幅杰作之一，大约完成于 18 世纪上半叶的吉祥天母的作画手法极尽其妙，十分注重细节描绘，属于新界画风格。其他的画像的表现手法很幼稚，使用强烈的色彩对比，属于西藏晚期，即 19 世纪末的表现手法。还要注意巴库藏品中一部分画作的世俗性，这也揭示了巴库对藏区文化这一方面的兴趣。



1912 年捐赠的这批藏品在四十年后又得到丰富。集美博物馆向巴库购买了一尊从云南带回来的观世音菩萨像和一组 22 幅画像。当时，作为亚洲理事会主席的巴库正处于极其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他用这笔所得慷慨地救助了亚洲理事会。对于博物馆而言，这些绘画作品与 1912 年的捐赠品相比并不属于其兴趣范围内的藏品。其中大部分是 19 世纪甚至 20 世纪初的出品。不过其中有一幅释迦牟尼像的绘制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上半叶。这幅画使用描金的手法绘制，因而也为这批画作的真实美学价值和自 17 世纪以降西藏中部绘画的布局形式提供了佐证。其中一些民俗画具有叙事的内容，似乎是某些戏剧的片段，很有可能作为藏剧的特殊爱好者巴库是因此而收藏了这些画。有一幅唐卡特别值得注意，这是一幅表现幼年莲花生的作品，其讲述的故事也是一出著名藏剧的内容。

巴库的全部藏品最终入藏集美博物馆说明博物馆世界对西藏艺术的认可，这个变化甚至出乎专家们自己的意料。这些藏品有助于对西藏艺术史的研究和对其丰富性的发掘，在这一点上，巴库作为藏学家堪称先知先觉者。

在回顾了巴库作为旅行家、藏学家甚至收藏家的一生后，必然要特别指出他为所有人都称道的高尚人品。他的礼貌、谦虚、慷慨和深刻的人性都体现在他日常生活和作品当中，还有他的科学性以及对生气勃勃的西藏的关注都使他，巴库，成为藏学界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

编后记：巴库 (Jacques Bacot, 1877-1967) 对纳西族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语言文字及古籍文献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尤其调研了云南的白地，白地被认为是东巴文化的发源圣地，这也是我们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组每年必去的地方，更是如今还有东巴祭司能释读东巴古籍的重要纳西族地域。巴库撰写并于 1913 年出版的《摩些研究》，是西方第一部纳西学研究专著，具有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和语言文字的考证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术特点，该书促进了西方和我国纳西学研究的兴起。



【文化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成立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发布

2016年10月16日，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成立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发布会在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国际纳西学学会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筹委会）、北京纳西学学会、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承办，我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部分代表以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各子课题负责人等应邀参加了会议。



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成立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发布会 白枫 摄

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对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成立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表示祝贺。白博士说，丽江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民族精粹纳西古乐与东巴文在这里传承，古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在这里交汇，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要通过政府主导，社会、民间力量的支持，做好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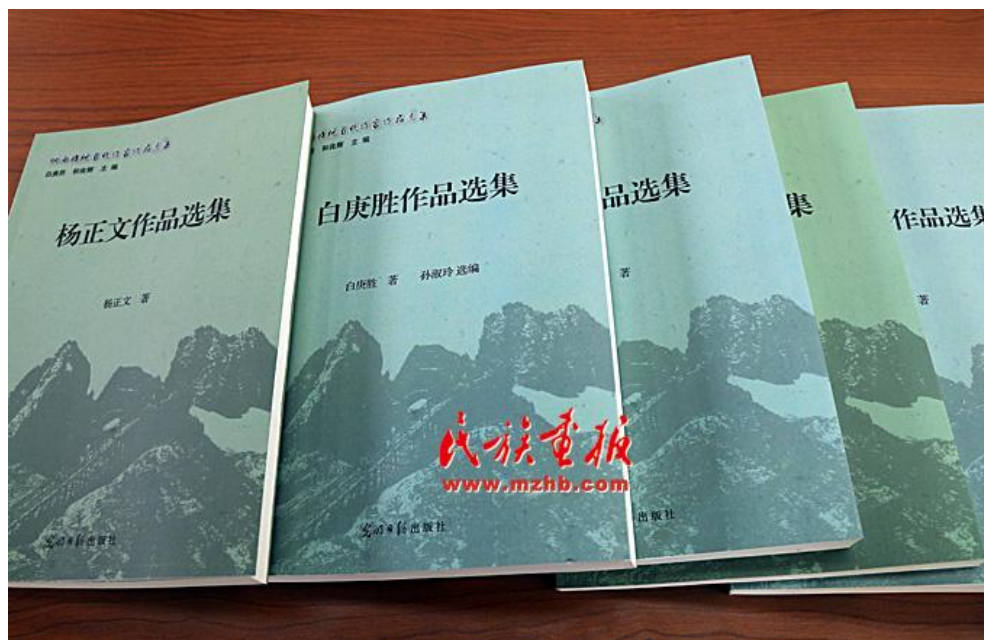


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在会上致辞 白枫 摄



左图：武汉龙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监事会主席郑延宁致辞
右图：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和丽萍与英国猛禽保护基金会代表宋文君签订合作协议

此次成立的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是丽江第一个公益性基金会，以保护与传承鹰猎文化为宗旨，依法帮扶纳西民间鹰猎文化活动，促进鹰猎文化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常态化健康发展。会上丽江鹰猎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和丽萍与英国猛禽保护基金会代表宋文君签订了合作协议。



发布会上展出的部分《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作品

会上，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段英对《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情况做了介绍，并将丛书作品发表时间限定在 1949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体裁主要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作品、戏剧文学、评论等，共入选作品 40 部。《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丛书出版彰显了当代纳西族文学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学的贡献。

民族出版社汉文室主任罗焰介绍了《李霖灿纳西学论集》出版情况和出版该书的意义。李霖灿先生之子、博物院史学者李在中先生在会上做了演讲，重点回顾了其父亲李霖灿先生在 30 年代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研究历史。



中华画院驻加拿大代表、博物院史学者李在中先生演讲 白枫 摄



项目组成员在李在中先生讲座后展开学术交流 白枫 摄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组成员与李在中先生在会议期间合影



纳西赤子 东巴行者 —— 追思挚友解毅先生

一个正直、为民、务实的清廉的领导，一个待人真诚的朋友，一个心系山高水长的行路人，解毅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用一生解释了纳西民族为什么能把千年东巴文化的古朴和真诚流传到今天。



北京八宝山竹厅 - 永远怀念亲人解毅



木建华代表促进会为解毅敬献花圈

这一天，我促进会姚进秘书长执笔代表大家为解毅先生写下悼念挽联，由木建华副秘书长代表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全体会员在北京的告别仪式上敬献花圈致祭：

为纳西历千万辛苦造福百姓诚雪山赤子
拯东巴引世界瞩目千古文明担玉龙护法

解毅是一个为纳西族人民和东巴文化奉献一生的纳西族精英，也是一位懂得以真情感恩的纳西族干部！时隔多年，我还记得解毅在丽江做县委书记时，我们促进会应他之邀，帮助丽江在北京拍摄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专家论证会，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室内没有空调，白枫在长时间拍摄专家评审时大汗淋漓，但仍在坚守，解毅在旁边感动地说，他会永远记住为纳西族作出奉献的朋友们，之后我们每次去丽江，他必定要亲自迎接，并一直称呼我们是他永远的好朋友。



丽江古城俯瞰 张旭摄于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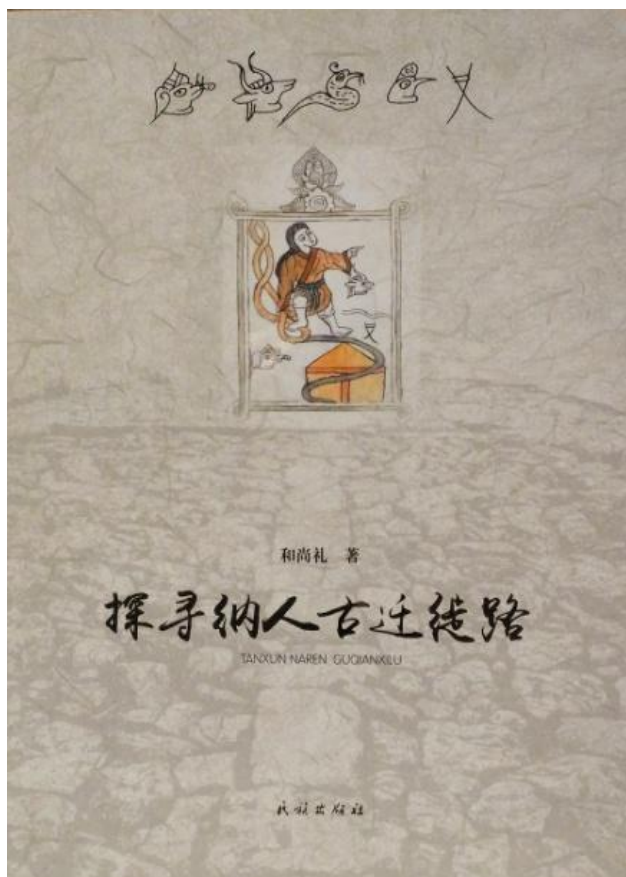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是我在1990年在丽江调研期间拍摄的古城，解毅说他特别喜欢，希望能收藏，并作为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图像资料。我在北京放大了照片，亲手送到他手中，他是那么高兴。我想就以回放这张照片来纪念解毅吧，愿老友在天国安息。

张旭 塔尤拉姆



【新书讯息】 New Book Message

《探寻纳人古迁徙路》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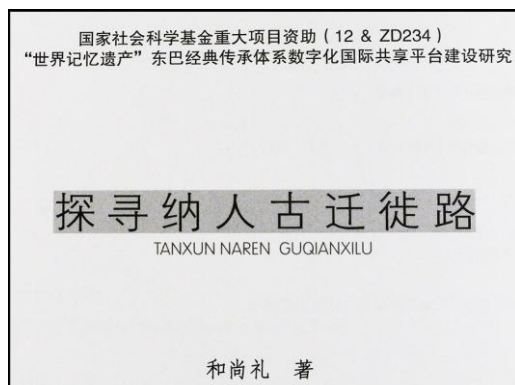


神秘的纳西民族有着无数的未知？远古纳西从何而来，历经那些，为什么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特殊的留存在中国西南部的群山，成为今天世界唯一活的象形文字文化历史遗存？云南香格里拉三坝纳西东巴文化圣地的民间研究者——和尚礼，致力于纳西古代迁徙路线的探索，在前人诸多著述中寻蛛丝马迹，大胆立论，细心求证，二十三年间多次个人或组织学者及东巴赴各地千里考察采访，对比印证，反复推敲，几易其稿，终于完成《探寻纳人古迁徙路》一书，虽少学究，但有新意。此著可以为今后纳西历史研究发端醒目。希望更多仁人志士，不断努力，耐心求证，相信纳西历史与东巴文化之谜终究会昭然天下。

和尚礼先生的《探寻纳人古迁徙路》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研究支持，并作为2016年的课题研究成果上报国家社科学规划办公室。我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在此为和尚礼先生祝贺。



和尚礼新著《探寻纳人古迁徙路》发行座谈会在昆明举行-2016.9.



本书获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资助

姚进 供稿



【国际交流】International Exchange

法国卢瓦河畔东巴文化传播之策划

2016年12月13日，初冬，天空飘着小雪花。就法国昂热副市长访问中国的契机，我会会长张旭在法国会员管儒生、会员张立等人的陪同下共同与昂热副市长 Benoit Pilet 先生、昂热市孔子学院法方校长辛达、中方校长王暖深入交流了东巴文化在法国的推广与宣传，张旭会长详细介绍了东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目前的保护与抢救、东巴文化促进会的抢救工作与使命。Pilet 先生深深被东巴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对东巴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协助东巴文化促进会在法国的交流与传播奉献一己之力。



张旭、张立与法国卢瓦尔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暖交流，并向昂热市副市长 Pilet 先生和孔子学院院长们展示东巴古籍

法国昂热孔子学院的两任院长也对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主动提出我会可与法国十几所孔子学院共同举办东巴文化在法国的巡回展览，令“世界记忆遗产”在法国乃至欧洲声名远播。

我会法国会员管儒生作为法国卢瓦尔河红酒协会的代表，为此次会谈做出了很多努力，并安排大家一起观看了由法国著名电影人庄宝纳和香港导演陈禹葭在丽江拍摄的电影短片《开往云的南端》，故事以纪录手法拍摄了一对中法年轻人在云南的邂逅与恋情。



促进会成员与法国各界人士交流，左起：促进会会员张立、巴图、张旭、管儒生，卢瓦尔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暖、法方院长辛达、香港电影导演陈禹葭、法国电影制片人庄宝纳、昂莱市副市长 Pilet 先生。

张立 供稿



回音壁

ECHO

【回音壁】



The Echo Wall

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促进会的评价摘选

方碧辉（中国英语特级教师）

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所有成都是值得引以为傲的…

哈博教授（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主席）

亲爱的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的同事们：

非常感谢您们把我放在提供您工作简报的邮件名单上，能让我近距离地研究你们的第12期简报，并分享那些有意义的文章和美丽的图片。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位高深莫测的植物学家、纳西学研究者约瑟夫·洛克，我们斯文赫定图书馆有他所有的出版物，我也曾对约瑟夫·洛克的研究做过很多次的演讲。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你的工作简报第12期，我想问一下，是否第11期简报也有数字版？我是否也能得到它？并在今后能收到所有的ADCA的简报？

…下一次我来北京时，希望能访问你们的促进会。

晓山（电视编导）

辛勤耕耘必有丰硕成果，如今拓开大路，成绩斐然。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蒙曦（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处主任）

…谢谢您给我带来的如此重要的工作进展。我深知您们付出了多年的艰苦工作，真的很高兴听到您的团队仍然在如此热情地继续努力工作着。

李东（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东方博物馆负责人）

…非常感谢听到项目正在对博物馆的东巴古籍馆藏进行翻译，非常感谢你们执行项目的新进展！我们也祝愿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将在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取得成功！

白维（教育工作者）

@塔尤拉姆/濒危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更是人类对待历史传承的态度，二十年如一日艰辛的工作，不为功利但已是功在千秋，佩服！

叶昆（舞蹈教练）

你们做的工作太有意义了，你们保护的都是文化宝藏。



苏灵（法国语言文化大学亚洲部主任）

…谢谢这些好消息，我们一直在极大的关注贵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进展，我会进一步与您联系，并跟进我们的合作。

王有才（电视制片人）

…以你们 30 年的追求为傲啊！文化传承的使者！

叶凡（解放军医生）

…东巴文化的科研和传承得力于你们的不辍坚守，祝贺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记忆遗产”。这是一项起点很高的文化事业，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祝愿促进会的发展开拓越走越好，继续获得更重大更深远的研究成果！

陈莉丽（外企退休高管）

你们做的是功在千秋的大事伟业！

白纶（大学教师）

@塔尤拉姆/真是太棒了！如果人类不是那么自大，就不会看不到自己的文明整体上已经走向没落，最近总觉得科幻片中的末世不远了，可能到那时人们才会明白文化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财富，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古月（自由职业者）

文明使者，文化卫士！敬仰。

钟际民（中国长城电脑有限公司前领导）

@塔尤拉姆/通过这次的年度交流，让我了解了你们工作的辛苦及取得的成效，真心的敬佩大家的努力与坚持，也相信这坚持与努力一定能使东巴文化继续存续和传承。

程诚（将措-加入促进会的社会公益人士）

感谢姚进老师的引荐，感谢培尤拉姆会长的认可，能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共同做如此殊胜的东巴文化保护和传承事业，荣幸至极，向各位老师多学习，也希望为东巴文化的传承出些绵薄之力。

… …

其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字都负载着一个真诚的愿望，也是我们抢救东巴文化的巨大的能量，也是我们心灵的营养和我们生命的动力。

真诚感谢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支持！



【简讯】

Newsletter

郑晓龙先生获“最佳导演奖”

我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顾问郑晓龙先生在第十一届电视金鹰节颁奖晚会上获得《最佳导演奖》！

白庚胜博士再次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顾问白庚胜博士在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纳西族“殉情”演出专场亮相 2016 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为期5天的“2016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在昆明举办，以纳西族传统文化“殉情”为主题的专场演出闪亮登场。

杨福泉博士撰写系列篇《纳人祖先文化寻踪散记》

云南纳西学会会长杨福泉博士在寻踪祖先之路的调研途中记述和展示了具有丰富本土文化的山川、河流、村寨与民俗，他在途径贡嘎山时，在撰写的《纳人祖先文化寻踪散记》中记述：李霖灿先生根据对麽些送魂路线的深入研究，推断贡嘎山可能是东巴经中经常提到的居那什罗神山，是纳人重要的迁徙路站。贡嘎山下的磨西镇之名，也与纳西他称“麽些”密切相关。



blog.sina.com.cn/yangfuquan



Members Update

天雨流芳

台湾艺术家于涌、蔡振源昆明办展

2016-11-09 18:43:30 [大公网](#)



于涌作品《无弦琴》

[大公网](#) 2016年11月9日讯（记者和向红）常居云南的台湾艺术家蔡振源、于涌将于19日举办“印象·真情”——两个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云南作品展暨艺术创作研讨会。两位艺术家把云南当作第二故乡，为此次展览精心准备了陶木、木石、水彩、油画作品50件，希望呈现一个独特的云南印象。

“印象·真情”活动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云南省文投集团、昆明经开区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指导，云南绿雪斋艺术馆具体承办。

于涌，云南绿雪斋艺术馆馆长。1998年底开始长居云南，致力于雅石、残陶与木雕、金属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具表面的指征意义，更蕴含生活哲理。云南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汤世杰评价说：“于涌的巧思在于将大自然已塑造成形的各类物件以其慧眼诗心加以过滤，尔后再度组接，呈现别样姿彩。黯然旧物一经他手，顿时润泽沉着、光可鉴人。驻足面对，细细揣摩，于会心处，便会思若潮生，感慨唏嘘。”



于涌作品《天雨流芳》

蔡振源、于涌两人都来自台湾，但都常居云南，把云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情出真品，两人独特的艺术作品在多个场合展览展示，也多次获奖，市场反响强烈。蔡振源把云南视为他产生最大情感的空间，他说：“我喜欢云南，这里最美的是情感。”于涌在云南成就了他的艺术之梦，“艺术的价值不在于作品的增值与否，不在于你的刀法多好、手艺多优秀，而在于是否能打动人心。”组织机构把两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放到一起展览、研讨，希望提供另一种观察云南的视角，感受云南别样之美，提升云南在全国艺术高地中的独有价值。



蔡振源作品《无题》之一



蔡振源作品《无题》之三

蔡振源的水彩画创作打破传统技法，以独特的审美视角表现内心情感，在水彩画传统技法上融入国画写意意境，巧妙处理光线、透视、色彩等元素以营造表现的氛围，在技法上独树一帜，中西融合，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及感染力。国外专业艺术机构评点其作品具有“心灵疗伤”作用，能拉近观众与作品的距离，引发心灵共鸣及精神沟通。蔡振源自 2013 年旅居云南，寄情于山水之间，激发了澎湃的创作灵感，将情感用画笔抒发到极致。他多次婉拒北京和巴黎画廊等艺术机构的邀请，发愿将余生留在云南继续创作。



于涌作品《吉庆有余》

编辑：张寻



恭祝所有的朋友们 2017 新春快乐！中国鸡年吉祥！

Wish all our friends Happy Spring Festival
&
Good luck in Chinese New Year of Rooster!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ADCA)